

WORLD AGRICULTURE

世界农业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核心期刊
-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农林核心期刊
-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
- ★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全文收录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协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刊名题字：吴作人
1979 年创刊
月 刊



世界农业编辑部
微信公众号

总字第 532 期
2023 年第 08 期

世界农业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马有祥

副 主 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广德福 马洪涛 朱信凯 刘天金 杜志雄 何秀荣 张陆彪 顾卫兵 隋鹏飞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林萍 韦正林 仇焕广 孔祥智 叶兴庆 司 伟 吕 杰 朱 晶 朱满德 刘 辉
刘均勇 李先德 李翠霞 杨敏丽 吴本健 宋洪远 张林秀 张海森 张越杰 陈昭玖
陈盛伟 苑 荣 苑 鹏 罗小锋 罗必良 金 轲 金文成 周应恒 赵帮宏 赵敏娟
胡冰川 柯文武 姜长云 袁龙江 聂凤英 栾敬东 高 强 黄庆华 黄季焜 程国强
蓝红星 樊胜根 潘伟光

主 编 刘天金

副 主 编 苑 荣 张丽四

执行主编 贾 彬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编 辑 吴洪钟 汪子涵 陈 璿 程 燕

SHIJIE NONGYE

出 版 单 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 单 位 中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 编 100125

出 版 日 期 每月 10 日

电 话 (010)59194435/988/990

投 稿 网 址 <http://sjny.cbpt.cnki.net>

官 方 网 址 <http://www.ccap.com.cn/yd/zdqk>

定 价 28.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

京朝工商广登字 20190016 号

ISSN 1002 - 4433

CN 11-1097/S

◆凡是同意被我刊发表的文章, 视为作者同意我刊将其文章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第三方。特此声明。

◆本刊所登作品受版权保护,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摘编。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陈珏颖 徐邵文 钱静斐 (5)
农村经济转型的国际经验比较、规律及政策启示	邱海兰 邓涵韵 廖文梅 (13)
食物供能结构视角下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影响的探析	翟天昶 (26)
超老龄社会的来临：韩国乡村老龄政策谱系及其展开	卞成日 芦 恒 (38)
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口风险演变特征与应对策略	冯 鹤 陈秧分 (51)
先富带后富的消费帮扶长效机制：基于复购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的分析	李晓红 易元鹏 冯 永 (63)
耕地碳汇与粮食安全保障协同推进的制度完善	白 洋 董雨瑞 李姿莹 (76)
家庭农场可持续成长能力评价及制约因素分析	兰 勇 贺忠连 谢先雄 (88)
市场风险经历与投保意愿：基于“保险+期货”试点的实证研究	翁可欣 熊 涛 尚 燕 (101)
农村“水土”如何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 ——基于中国西部脱贫县的调查	甘 宇 魏 祥 (113)
其他	
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与贸易形势月报（第21期）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 (125)
国际粮农动态：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大使出席“77国集团和中国”罗马分部全会等4则	(130)
2023年7月世界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李蔚青 (133)
农业贸易百问：泰国榴莲何以快速走进我国消费者的视野？	刘文泽 刘 岩 (139)

-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 *CHEN Jueying, XU Shaowen, QIAN Jingfei* (5)
-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mparison, Law and Policy Enlightenment of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QIU Hailan, DENG Hanyun, LIAO Wenmei* (13)
-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Russia-Uzbekistan Conflict on African Food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Energy Supply Structure
..... *ZHAI Tianchang* (26)
- The Coming of Hyper-aged Society: the Genealogy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ging Policy in South Korea
..... *BIAN Chengri, LU Heng* (38)
-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jor Agricultural Import Risk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 *FENG He, CHEN Yangfen* (51)
-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onsumer Assistance by Bringing the Rich First and the Rich Later: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purchase and the Grouping Path
..... *LI Xiaohong, YI Yuanpeng, FENG Yong* (63)
- Research of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for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Cultivated Land Carbon Sink and
Food Security
..... *BAI Yang, DONG Yurui, LI Ziyong* (76)
-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Growth Capacity and Analysis of Restricting Factors of Family Farm
..... *LAN Yong, HE Zhonglian, XIE Xianxiong* (88)
- Market Risk Experience an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dopt Insur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Insurance Plus Futures" Pilot
..... *WENG Kexin, XIONG Tao, SHANG Yan* (101)
- How do Rural "Water and Soil" Affect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a Survey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Western China
..... *GAN Yu, WEI Xiang* (113)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陈珏颖 徐邵文 钱静斐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相关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值得世界各国各地区学习、借鉴。本文从当前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进展及问题出发,分析了典型国家和地区相关的实践经验和成功做法,结果表明:全面系统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统筹高效的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多元主体协作参与、公开透明的信息响应和披露制度等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做法,有助于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关键词: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国际经验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3.08.001

作为食品安全的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中国农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产品供给已由保“量”到提“质”转变,这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创新的重要抓手,能有效助推市场监管由“被动”向“主动”,管理对象由“产品”向“主体”的转变。《“十四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明确将信用监管作为机制创新纳入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中。2022年9月2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从法律的高度和力度规范农产品质量,保障公民“舌尖上的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成为中国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持续改善,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十三五”时期,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的水平,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及“菜篮子”产品大县的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88%。但需要认识到,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尚在起步阶段,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产品质

收稿日期:2022-11-01。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碳’目标下北京都市有机农业生态价值评估及多元补偿机制研究”(21JJB010),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项目“关于进一步发挥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效能作用的研究”(14225051),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国际农业经济与贸易”(10-IAED-04-2023)。

作者简介:陈珏颖(1984—),女,北京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农产品贸易,E-mail:chenjueying@caas.cn;徐邵文(1999—),男,安徽灵璧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农产品贸易,E-mail:xsw0637@163.com。

通信作者:钱静斐(1982—),女,安徽郎溪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全球农产品市场与贸易,E-mail:qianjingfei@caas.cn。

量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相应的监管工作也存在诸多挑战。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多数在“菜篮子”大县等食用农产品监管较完善的地区完成,这意味着其他下沉地区市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仍存在较大风险,在高抽检合格率外仍有2%~3%的不合格产品成为“难啃的硬骨头”^[2-6]。农产品质量监管仍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信用档案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来提升整体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现有研究认为,农产品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生产周期长、链条长、环节多、质量无法快速检测等特征^[7-8],消费者也很难辨认诸如农兽药残留、激素残留等内在质量属性^[9],农产品市场交易双方容易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7,10-11],具有信息优势的经营主体可能在获取超额利润的驱动下选择失信行为^[12-13]。与此同时,如果质量安全监管缺失或不足,则会为失信行为提供空间^[11,14]。在市场监管中,一般采取抽检的方法来确定农产品是否达到质量安全标准:一方面,抽检成本会随样本和频次增加而上升^[13];另一方面,事后抽检的被动监督由于无法覆盖所有农产品,存在不合格农产品漏检或较长时间才能被检出的问题,监督效用有待提升。构建和完善质量安全信用体系有利于解决农产品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10],也有助于达到降低农产品质量监管成本和提升质量监管效用的平衡点^[13],是对传统农产品质量治理方式的积极创新^[3]。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普遍起步较晚,发展水平滞后,社会信用意识不强;相比之下,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建设、全食物链监管理念、信息披露机制等相关实践经验比较丰富^[15-17],值得深入学习和借鉴。

本文基于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其信用体系建设现状,结合欧盟、美国、日本的相关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其信用体系的对策建议。

1 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的建设进展

目前,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地各部门在试点探索中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取得了积极进展。

1.1 信息管理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中国已逐步建立以科学、合理、公平为原则,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收集、管理、考核等内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度框架,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随着《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农资和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档案的通知》《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归集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意见和办法陆续出台实施,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制度框架基本形成。2022年9月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进一步明确将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点任务。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不断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制化进程持续提速。各地也积极出台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法规、工作方案、规划与办法等加强监管工作,尤其以农业投入品和生产经营为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完善信用信息登记工作,落实生产经营主体的诚信责任,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实行问责制等方面,基本实现有据可查、有规可循。

1.2 全国范围试点示范稳步推进

为探索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和有效办法,全国范围内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各地从本地农业生产实际出发,开创性地将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与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性保险发放、政府投资项目扶持等举措相关联,逐步探索出从记录、评价到运用的全方位信用监管模式,显著提升了当地农产品质量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各地实践中,北京市按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规模和生产类型,以责任主体和流向

管理为重点,建立了主体追溯、履历追溯、全程追溯的农产品追溯模式,并整合监管、执法、检测等各部门数据,加强对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等质量安全关键环节进行综合监管;陕西省安康市结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多种技术手段加强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信用服务和管理,并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激励、质量安全信用奖惩制度等,形成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

1.3 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有序开展

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智能监测、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互联网+信用监管”机制得以形成。依托大数据技术可完成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风险监测和舆情监控等信息电子化,移动互联网可辅助实现生产经营主体备案和农产品原产地定位。为有效推进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农业农村部以在官网开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专栏的形式建立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完善、整合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对接和信用记录电子化存档,并将各地各部门报送的失信信息导入农业行政审批综合办公和农业财政项目管理等工作系统^[3,18],推进部门间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加大对信用主体的监管力度。

2 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建设、全食物链监管理念、信息披露机制等相关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值得深入学习和借鉴。

2.1 欧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经验

20世纪90年代,病牛病、二噁英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在欧洲暴发,导致消费者一度对欧洲食用农产品安全状况产生信任危机。为重塑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欧盟开始全面完善食品安全治理。

2.1.1 覆盖全食物链的法律法规体系

欧盟食品法律法规具有种类多、涉及广、系统全面、可操作性强等特征。以《食品安全白皮书》为框架,以《一般食品法》《食品卫生法》等7部法规为支撑(图1),涵盖种植养殖良好操作规范、动植物疫病防控、农兽药残留物和污染物控制等各方面^[19]。《一般食品法》(EC178/2002)和“确保符合食品饲料法、动物卫生与福利法规定的官方控制”(EC882/2004)法令是欧盟内食品立法的法律基础。《一般食品法》奠定了欧盟食品法的基本原则,覆盖“从农田到餐桌”所有生产和加工环节的全食物链。欧盟在全食物链的质量安全监管中尤其注重追溯制度和食品标签制度,通过信息可追溯系统,强化食品产业链上各经营主体责任意识,实现从前端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各环节监管,同时方便消费者查询产品来源地、生产商、生产流程等全方位信息。通过《食品营养标签指令》对特定类别的食品实行专项管理,使消费者能充分地了解食品信息。以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食品标识管理等为基础,覆盖全食物链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为欧盟的农产品安全信用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2.1.2 统筹协调的质量安全监管模式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常设执行机构,也是立法机构,负责制定与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指令。欧盟各成员国具有独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为统筹协调各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监管,由中央银行和个人征信报告机构共同设立中央信用登记系统,协助政府收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各成员国需要依据欧盟委员会的组织管理规则来实施各自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设立专门负责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部门,包括卫生与食品安全司、欧洲食品安全局、食物链及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其中,欧洲食品安全局的主要职责包括监测欧盟内整体食物链的安全性,收集和分析食品数据及其与任何潜在危害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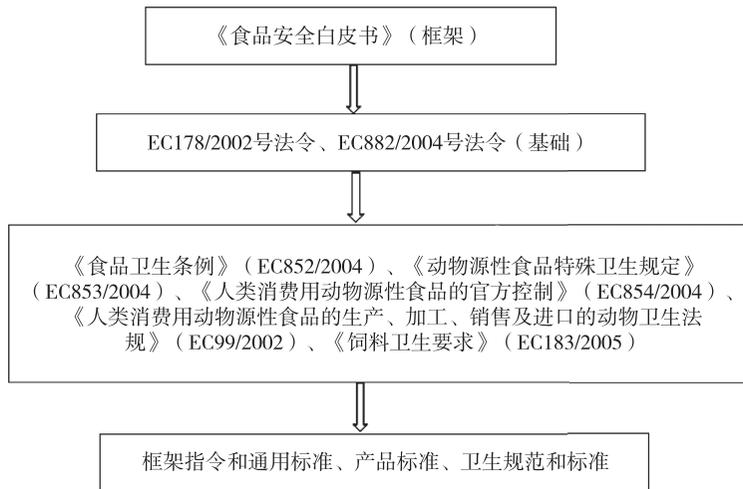


图1 欧盟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关的信息，对紧急危害情况进行识别和预警等。统一监管模式有效避免了各成员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各自为政”的局面。

2.1.3 以事前预防为主的食品安全信息响应系统

欧盟建立了以风险评估和快速预警为核心的食品安全信息响应系统。在风险评估方面，欧盟主要采用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局具有独立调查权，对食品和饲料进行风险调查和评估，同时作为信息中心，负责为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出具评估数据和提供评估结果，并将评估结果同步对公众公开。在快速预警方面，为使消费者能及时感知风险和规避风险，欧盟建立了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RASFF系统会在第一时间针对不符合安全要求、标识不准确等原因引起的食品和饲料安全风险进行响应，并向成员国通报。各成员国对风险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经由成员国传递给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根据风险严峻程度批准成员国采取应急措施，对于来自欧盟内部的食物或饲料，实行暂停投放或使用措施，对于来自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实行暂停进口措施。通过RASFF系统，一方面使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之间及时共享风险信息，达到协调立场、防范风险和抵御危害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提示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针对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未涉及，但可能对人类健康带来直接或间接危害的情况，欧盟委员会采用一般危机管理方案，在食品安全局的技术支持下，成立危机小组对风险信息进行收集和评估，并确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2.2 美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经验

美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基础上，并采取纵向管理的方式来规范食品的质量和安，即采取按食品类别来划分部门职能，各部门由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协定，对食品安全进行一体化监管。

2.2.1 系统性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建成了综合性条款与详尽性规定兼备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使食品质量各环节的监督、风险预警和应急反应都有法可依。从1906年国会通过的《纯净食品药品法案》至今，美国联邦政府共制定和修订了35部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的重要联邦法律有7部，分别为《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联邦肉类检验法》《禽类产品检验法》《蛋产品检验法》《食品质量保护法》《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法》《公共卫生服务法》，并辅以各州独立的农产品质量监管法规条例。在对重点产业扶持方面，美国自1990年《食品与农业贸易保护法案》起陆续出台多个农业法案对有机农业生产、加工、销售、

贸易等方面进行扶持^[20]。

2.2.2 多元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信用监管

在政府监管方面,由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环境保护署(EPA)负责国家整体食品安全监管。各监管部门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保持各自相对独立的同时又互相配合,确保各项监管工作能够快速高效的开展。同时美国政府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纳入联合监管网络。在征信服务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的信用中介服务蓬勃发展。美国社会对信用度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领域也不例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一旦在市场中出现失信行为,其生产经营活动将受到极大制约。在美国有众多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依法为食品企业提供征信服务。以最为著名的邓白氏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841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信用评估公司之一。美国政府要求企业在FDA注册时,必须使用邓白氏编码系统作为企业信息识别符号。在社会监督方面,美国鼓励公众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一方面,通过信息发布与教育培训,帮助消费者更多更好地掌握食品安全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权益损失;另一方面,畅通信息反馈渠道,通过市场调查评估、接办投诉建议等途径来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

2.2.3 高效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

美国食品安全信用监管的突出特点之一是通过建立高效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保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的高效性体现在:美国食品信息披露主体以联邦政府为主,以各州政府为辅,按照各部门监管范围进行职责划分。如FDA负责本国及国外引进的食品安全,主要监管对象为未加工的蛋类。USDA食品安全检验署负责本国及进口加工肉类和家禽制成品。USDA动植物卫生检验署主要监管动植物类制造食品。多级联动管理体制和环节相互衔接的监管体系为问题追溯打下基础。公开透明性体现在:一是通过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系统,及时公布食品市场监测、不合格食品召回等信息,使消费者能及时准确了解食品安全情况。同时,政府严格要求媒体公布的信息必须保证客观性和准确性,不得以新闻炒作来牟取利益。二是由USDA通过热线为消费者解答食品安全、营养搭配等方面的问题,并提供相关知识指导、教育和培训。三是设立消费者食品安全投诉系统。四是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五是建立严格的食品召回制度,规定生产经营者有义务召回不达标产品。

2.3 日本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经验

2001年和2002年日本相继暴发病牛病、牛肉原产地标签错误等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引发国民对国家农产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呼声。于2003年颁布的《食品安全基本法》标志着日本现代食品安全监管进入新阶段。相较于欧美国家,日本耕地面积小、农业生产经营分散等特征突出,营销模式以批发市场为主,农产品需要历经多个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餐桌,这对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3.1 高效的分权管理体制

日本奉行全程监管、风险分析先行的食品安全信息监管理念,并且实行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独立的权责管理体制,保证产业链上任一环节都有相关部门对应负责。2003年日本政府在颁布的《食品安全基本法》中引入风险分析评估机制,构建了风险评估、管理、沟通的制度框架。同时,日本明确国家、地方及行业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职能分工,鼓励消费者广泛参与维护食品安全。为保证食品安全监管效力,日本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权责剥离,于2005年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负责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日本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主要负责风险管理。日本在食品安全委员会、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三者间还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图2)。食品安全委员会对食品中有害物质含量进行风险评估,预估不安全程度和对消费者健康的受损程度,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等部门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同时消费厅下设机构消费委员会同步在网站上公示相关食品安全信息和风险提示,并设立接待窗口接受消费者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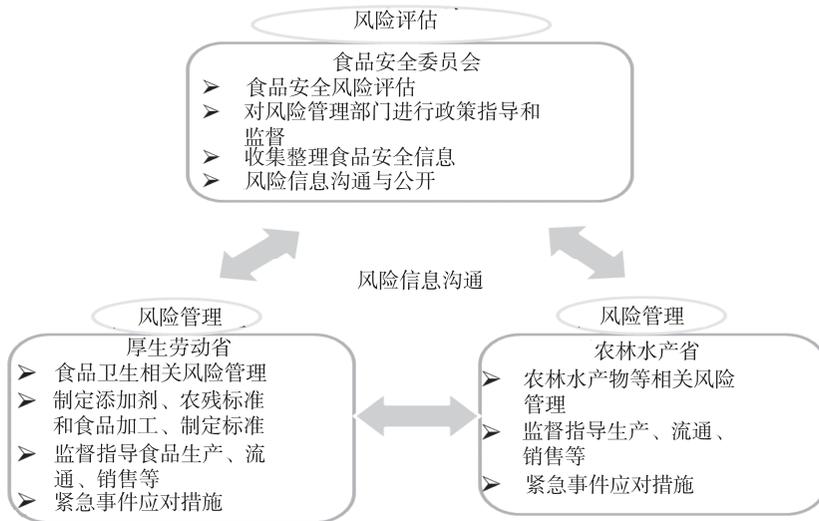


图2 日本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职能及职责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及厚生劳动省。

2.3.2 多元主体协作的信用监管服务体系

日本鼓励第三方社会质量安全鉴定机构发展并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监管。行业协会在日本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征信业也由行业协会以第三方的角色进行主导。区别于欧盟公共征信模式和美国市场化模式，日本征信业逐渐形成了由行业协会主导、实行市场化运作的混合模式。目前，日本三家主流征信机构：日本信用情报机构（JICC）、信用信息中心（CIC）以及全国银行个人信用情报机构（PCIC）均由行业协会成立。与此同时，日本还构建了以公众参与为主体的食品质量安全社会监督体系，一方面鼓励公众对食品安全进行舆论监督，另一方面重视加强对消费者的食品质量安全教育。

2.3.3 重视以新兴信息技术赋能食品安全信息共享与交流

通过加强生产经营者的信息公开、披露和共享，推动监管部门、生产经营者、消费者、行业协会等机构之间的食品安全信息共享与交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日本重视运用新兴技术对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技术支撑。日本建立了覆盖农产品批发市场、农协和种养大户的信息网络，畅通了产地、市场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提高了农产品市场运行的透明度。同时，实现了对全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记录，建立了严格的溯源追责制度。

3 国际经验对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启示

与欧盟、美国、日本相比，中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领域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亟须解决。一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的管理体系和法规制度不够系统、细致、具体，各执行单位间缺乏关键协作，使得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职权重合和监管盲点^[21-22]。二是多主体在信用监管格局中的参与度有待加强。三是利用新兴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23]。因此，需要参考借鉴国际经验来完善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3.1 加快建成职能分工明确的垂直管理体系

无论是相对集中的欧美模式，还是分权而治的日本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都由一个主管部门或委员会专门来统筹负责部门和地区间的制度协调。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首要的是做好顶层设计，遵循“依法依规、改革创新、协同共治”的基本原则，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理念和制度方法，构建以农

业部门或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为核心监管部门的信用体系垂直管理模式,优化机构配置,明确各部门分工职责,并建立部门间横向协作机制,引导各地相关部门配置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形成高效统一、分工明确、密切协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管理体系。

3.2 鼓励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治理

创新传统的单一监管模式和参与机制,以政府监管部门为治理主体,将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消费者、行业协会、市场信用服务机构、媒体等各类参与主体纳入其中,实现监管资源共享和监督,不断拓展信用协同治理新格局。以共治理念实现群策群力,在督促各方参与主体承担应尽责任的同时保障各方主体权利,推动各方参与主体共享农安信用治理的建设成果。

3.3 优化信用信息采集手段和共享机制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实现监督智能化和自动化,及时对农产品生产全链条、多主体的信息数据进行收集、更新和交换,有效保证信用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达到更新及时性,并确保在多部门间可交换。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征信监管平台建设,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实施动态监测。推进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信用记录电子化存储,推进行业内信用信息互联互通,提高主体信用信息的透明度,逐步形成主体全覆盖的信用信息网络。

参考文献

- [1] 农业农村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的通知 [EB/OL]. (2022-02-24) [2022-12-08].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2/24/content_5675448.htm.
- [2] 肖放. 新时代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形势与任务 [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19 (1): 3-6.
- [3] 肖放. 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 and 重点任务 [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20 (5): 3-6.
- [4] 张小允, 李哲敏, 肖红利. 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探析 [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8, 20 (4): 72-78.
- [5] 胡冰川. 强化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J]. 中国市场监管研究, 2020 (2): 30-32.
- [6] 熊佳梁, 黄宣运, 许彦阳, 等.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发展历程、现状和展望 [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21, 112 (4): 5-10, 17.
- [7] 刘成, 郑晓冬, 李姣媛, 等.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的经济分析和经验借鉴: 基于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的视角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7, 16 (3): 362-368.
- [8] 于仁竹. 中国农产品诚信交易的协同管理研究: 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视角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 (9): 159-168.
- [9] 郑少锋. 农产品质量安全: 成因、治理途径和研究趋势 [J]. 社会科学家, 2016 (5): 8-14.
- [10] 李静.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 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 36 (4): 191-196.
- [11] 薛钦源, 陈松, 张小栓, 等. 农产品质量安全失信成因和对策 [J].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17, 23 (6): 9-11.
- [12] 黄秋怡, 郑小平.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与发展对策研究 [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19 (1): 30-34, 54.
- [13] 薛钦源, 占鹏, 郑小平.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治理体系及发展对策研究 [J]. 农业展望, 2021, 17 (8): 35-41.
- [14] 杨松, 庄晋财, 王爱峰. 惩罚机制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投入演化博弈分析 [J]. 中国管理科学, 2019, 27 (8): 181-190.
- [15] 薛思蒙, 邓金香, 裴昕, 等. 不同模式下的发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经验与启示 [J]. 世界农业, 2017 (6): 4-11.
- [16] 高鸣, 迟亮, 宋洪远. 发达国家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经验与启示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8, 39 (5): 725-733.
- [17] 肖湘雄, 周梦芬. 发达国家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做法与启示 [J].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21 (5): 16-26.
- [18] 朱莹, 刘海华, 邓玉, 等.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管理制度研究 [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22 (3): 65-68.
- [19] 谢兰兰. 标准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应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92-94.
- [20] 钱静斐, 李宁辉. 美国有机农业补贴政策: 发展、影响及启示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 (7): 103-109, 112.
- [21] 田新霞, 赵建欣. 国内外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比较: 理念、体系与制度 [J]. 河北学刊, 2016, 36 (1): 216-220.
- [22] 周洁红, 武宗励, 李凯. 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成就与展望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 274 (2): 4-14.

[23] 吴晓柯, 任璐怡, 吴飞艳. 农业生产主体信用评价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J]. 浙江农业科学, 2021, 62 (12): 2538-2540.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CHEN Jueying XU Shaowen QIAN Jingfei

Abstract: Currentl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credit system has entered a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credit system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started earlier and developed faster, and the relevant practical experience is richer, which is a case of study and reference for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evant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successful practices of typic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the 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credit system,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ound system of food safety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 coordinated and efficient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model;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entities; and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response and disclosure system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will help China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quality and safety credit system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Keyword: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Credit Syste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农村经济转型的国际经验比较、 规律及政策启示

◆ 邱海兰 邓涵韵 廖文梅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昌 330044)

摘要:农村经济转型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有其共性规律和区域差异。本文基于1991—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数据,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剖析不同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阶段特征,并以农村减贫为例考察其转型效果,在此基础上开展农村经济转型的类型学研究,揭示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研究发现,近三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速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制度革新、市场改革、技术应用、土地规模化和城市化等因素是推动农村经济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且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越快,减贫效果越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加快农业转型速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与农村经济转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关键词:农村经济转型;结构转型;转型路径;转型效果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3.08.002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特别强调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要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理清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和转型路径,才能有效避免走弯路^[1]。比较不同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经验,总结其普遍特征和一般规律,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不少学者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就农村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相关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生产逐渐倾向于

收稿日期:2023-0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对接电商市场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2CGL02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与规律研究”(71934003),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技术变迁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作用路径与规律研究”(GJJ21046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相对贫困视角下农机服务与农户减贫作用机理研究:驱动力与支持政策设计”(JJ21227)。

作者简介:邱海兰(1993—),女,江西上饶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E-mail: qiu hailan@jxau.edu.cn;邓涵韵(2004—),女,江西宜春人,本科生,研究方向:农村经济,E-mail: 2165517893@qq.com。

通信作者:廖文梅(1978—),女,江西万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经济,E-mail: liaowenmei@126.com。

资本化^[2], 表现为土地等生产资料为农业企业所掌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兴起^[3]。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 尽管受行政力量的影响, 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 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农业转型, 但由于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小农家庭经营的韧性^[4], 农业呈现“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特征^[5], 农业资本化经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中国农业依旧维持着以小农生产为主导的生产经营格局^[6-7]。随着农业生产供需矛盾日益凸显,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村经济转型的经验模式^[8], 如日本的乡村振兴运动^[9-11]、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12-14]以及欧美国家的多产业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模式^[15-16]。此外, 部分学者进一步探究了农村经济转型的效果, 包括对农村非农就业、减贫和农民收入的影响^[17-19]。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农村经济转型包含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 需综合考虑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和演变过程; 二是多数研究缺乏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转型经验比较, 集中讨论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在农村转型过程的某个阶段的问题, 不利于客观总结农村经济转型的规律和特征; 三是缺乏将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阶段与效果放置于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 不利于揭示其内在逻辑关系。鉴于此, 本文以 1991—2018 年世界主要国家为研究对象, 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理清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阶段, 并进一步测度其转型效果, 归纳各国转型的一般规律, 以期为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实现。

2 世界主要国家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

基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AD) 定义的农村经济转型, 本文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对不同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进行分析, 具体以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农业劳动增加值两个指标对农业转型进行衡量, 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劳动力转型进行衡量。

2.1 农业转型

2.1.1 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变化

(1) 亚洲

从亚洲总体看 (图 1), 随着食物需求结构和农产品市场的变化, 农业生产相应地进行了转型调整, 由原先以低价值的传统作物为主 (如谷类产品), 逐渐转向更具多样化和商品化的高值农作物, 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不断上升。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数据可知, 亚洲谷物播种面积比例不断下降, 由 1961 年的 64% 下降到 2015 年的 50% 左右, 而高值作物不断增加。尤其是养殖业增长迅速, 1961 年畜产品与谷物的产值之比仅为 1:9, 到 2015 年其产值之比上升到 1:3。农业转型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 收入增长、城市化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促使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发生改变, 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 农产品消费更加多样化和安全化^[19]; 另一方面, 农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供应链系统创新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生产结构向商业化、竞争性转变。

从主要国家看, 转型差异较为明显。农业转型速度较快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老挝、越南、印度, 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的农业则往反方向转型。具体而言, 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上升了 9.75%、9.28%、13.74%、8.97%, 增长幅度较大。老挝、印度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上升了 4.37%、1.47%, 增长幅度较小。与之相反的是,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负增长。其中, 菲律宾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下降幅度最大。相比于 1991—2000 年, 菲律宾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在 2011—2018 年下降了 4.32%, 由原先的 76.26%, 下降为 71.94%。可见, 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在亚洲农业转型中处于第一梯队。

日本和韩国早期的“新乡村建设”和“新村运动”为其农业快速转型提供了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日本开始了“一村一品”运动, 实施差别化的农产品经营战略, 扩大非谷类农产品的生产规模 (如青梅、板

栗等特色农产品), 延伸非谷类农产品的产业链条(如将青梅加工为调味品、酒等, 将板栗制成栗羊羹等点心食品), 着力发展经济作物, 大幅提升了非谷类农产品产值, 也促进了日本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随之, “一村一品”运动的理念开始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认同, 成为发展中国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消除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2000年以后, “一村一品”的观念逐渐演化为“农业六次产业化”, 旨在发展农业第三产业, 提升非谷类农产品的附加值。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既符合产业化发展逻辑, 也满足了农业转型的现实需要, 是新型农业产业化重要表现, “农业六次产业化”则是前者的进一步升华, 两者在日本农业经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日本不同的是, 韩国的农业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制度的革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 韩国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制度, 允许农民参与地方农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制定, 提升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具体而言, 通过结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并开展农业人才培育, 举办各类农民培训活动, 推广“一社一村”运动, 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 促进农村产业化升级。党的十九大以来, 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等战略的稳步实施, 也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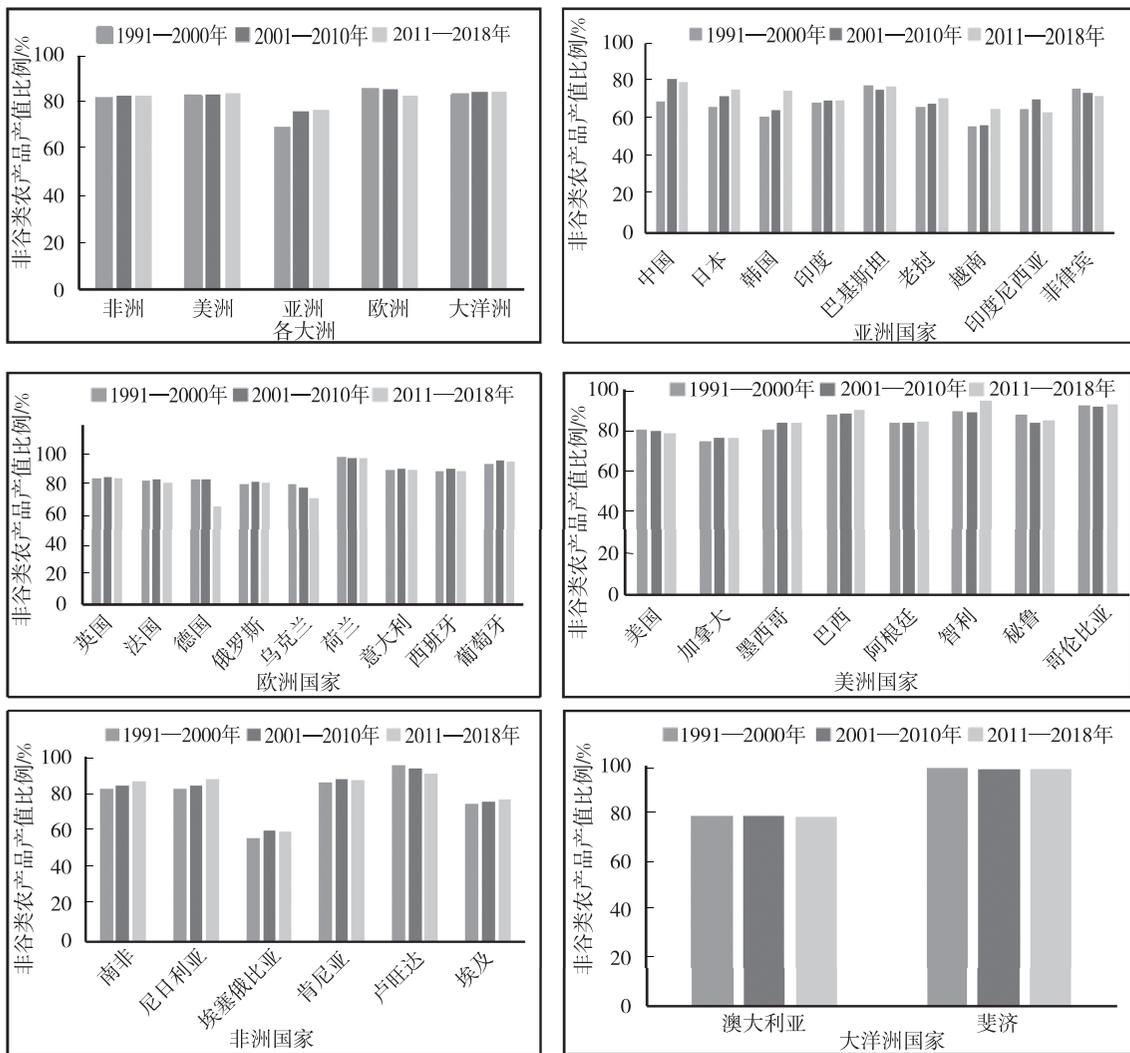


图1 1991—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
数据来源: FAO数据库。

(2) 欧洲

从欧洲总体看, 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1991—2000年, 欧洲非谷类农产品产值

比例平均为 85.68%，到 2001—2010 年下降了 0.4%，为 85.28%，而到 2011—2018 年，其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为 82.93%。可见，尽管欧洲高值农产品产值仍占有较大比例，但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其谷类农产品生产出现了适度反弹。欧洲谷类农产品（粮食）生产增加离不开其实行的移民政策。本地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增加，加之粮食产业的低工资，使得粮食生产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而欧洲大力实行的移民政策，为粮食生产补充了大量且低廉的劳动力^[20]。如希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中 90% 为国际移民，德国接待了约 30 万名季节性农场工人，人数长期居高不下^[21]。在北欧，移民工人的大规模流入已经成为其农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支撑力量，保障了其谷类农产品正常生产。

从主要国家看，各国非谷类农产品产值变化差异较为明显。英国、法国、德国、乌克兰、荷兰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德国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下降最为明显，由 1991—2000 年的 83.58% 下降到 2011—2018 年的 65.65%，下降了 17.93%。英国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下降幅度最小，从 1991—2000 年的 84.20% 下降为 2011—2018 年的 84%，下降了 0.2%。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升，分别增长了 0.14%、0.52%、1.85%、0.94%。以葡萄牙为例，其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在 1991—2000 年平均为 93.77%，到 2011—2018 年上升为 95.62%。这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农业转型的变化方向差异明显。

(3) 美洲

从美洲总体看，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在 1991—2018 年有所上升。其中，1991—2000 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为 82.57%，到 2001—2010 年上升了 0.39%，为 82.96%，而到 2011—2018 年，其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增长为 83.55%。可见，美洲的农业生产正持续向高值农产品转型。

从主要国家看，各国农业转型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和秘鲁在 1991—2018 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有所下降。特别是美国，其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由原先的 80.41% 下降为 78.62%，下降了 1.79%。美洲其他国家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如智利由原先的 89.06% 增长到 94.47%，上升了 5.41%，增长幅度最大。而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分别上升了 1.21%、3.40%、2.20%、0.45%、0.81%。这表明，以智利为代表的部分美洲国家的农业转型幅度普遍高于欧洲国家。而美国凭借其技术、机械化、专业化分工、土地资源等优势，在谷类农产品国际市场中长期保持较高的竞争力，商品谷物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其支柱型农业产业，其小麦、玉米和大米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尽管美国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明显高于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但谷类农产品仍是其农业生产的重心之一。

(4) 非洲

从非洲总体看，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1991—2000 年，非洲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为 81.83%，到 2001—2010 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平均为 82.67%，上升了 0.84%，而到 2011—2018 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上升为 82.78%。可见，非洲农业生产结构正逐渐转向更具多样化和商品化的高值农业。过去几十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兴起，非洲城市居民对非谷类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推动了农业生产结构从谷类产品向非谷类产品调整，增强了农业集约化程度^[22]。城市化可能会通过食品和农产品需求的变化导致农业转型^[23]。城市居民对更高质量农产品的消费和偏好不断增加，提升了高值农产品的生产意愿和规模^[24-25]。

从主要国家看，多数国家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如南非、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埃及。其中，尼日利亚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上升最快，由原先的 82.39%，增长为 87.98%，上升了 5.59%。南非和埃塞俄比亚分别上升了 3.80% 和 3.49%。与之相反的是，卢旺达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出现负增长，由 1991—2000 年的 95.49% 下降为 2011—2018 年的 90.68%，平均下降了 4.81%。可见，部分非洲国家在近三十年加快了农业转型进程，农业生产趋向于多样化。

(5) 大洋洲

从大洋洲总体看，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991—2000 年，大洋洲非谷类农产

品产值比例平均为 83.27%，到 2001—2010 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上升为 84.20%，而到 2011—2018 年，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下降为 84.17%。

从主要国家看，澳大利亚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1991—2000 年平均为 79.30%，而到 2011—2018 年下降为 78.54%，下降了 0.7%。斐济的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变化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由 2001—2010 年的 98.32% 上升为 2011—2018 年的 98.58%，增长了 0.26%。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继续发挥以小麦为主导的谷类农产品生产优势，而斐济则进一步沿袭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粮食自给率较低。作为岛屿国家，斐济缺乏足够的资源种植土地密集型的谷类产品，而集中于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以及畜牧业发展。可见，土地等自然资源是影响农业转型方向的主要因素。

2.1.2 农业劳动增加值变化

基于世界银行 (World Bank) 数据可知，亚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 1991—2018 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 2)，年均增长率为 5.4%，表明亚洲过去几十年农业生产能力不断增长^[26]。其中，中国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16.7%。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老挝、巴基斯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9%、6.8%、5.9%、4.8%、3.5%、2.5%、0.9%。日本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速度最慢，年均增长率仅为 0.1%。过去几十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大多经历了社会和经济制度改革、技术革新等阶段，并持续加大农业投入，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使得农业劳动增加值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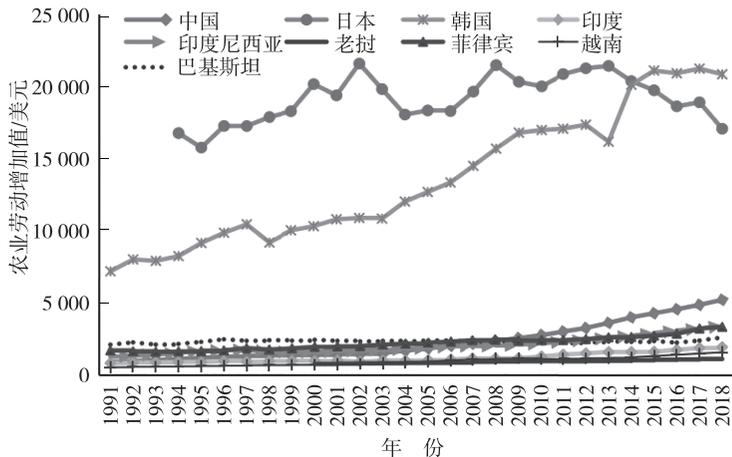


图 2 1991—2018 年亚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数据库。图 3 至图 8 同。

欧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 1991—2018 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 3)，年均增长率为 4.9%。其中，法国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 7.2%；乌克兰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升速度次之，年均增长率为 7%。西班牙、俄罗斯、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英国的农业劳动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2%、6%、4.9%、4.1%、3.1%、3%。德国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慢，年均增长率仅为 2.2%。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为欧洲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共同农业政策将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转向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促进了农产品育种、加工和营销等农业产业链发展，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增加值。

美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 1991—2018 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 4)，年均增长率为 5.7%。其中，阿根廷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9.7%，智利和巴西次之，分别为 9.6%、9.5%。加拿大、美国、秘鲁、墨西哥的农业劳动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7.1%、3.8%、2.4%、1.6%。哥伦比亚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慢，年均增长率为 1.5%。美洲发展中国家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新技术使用中效果显著。以阿根廷为例，由原先种植玉米、大豆等低附加值产品，逐渐发展为生产生物质燃料，进一步提升了种植产业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非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 1991—2018 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 5)，年均增长率为 4.2%。其中，尼日利亚的农业劳动增加值上涨最快，年均增长率为 11%，卢旺达和埃及次之，分别为 5.7%、4.8%。南非、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劳动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6%、2.3%。与之相反，肯尼亚的农业劳动增加值呈现下降趋势，年均减少了 1.1%。这主要源于非洲中等规模农场的增加，加之新技术、新种子的推广和引用，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27]。例如在尼日利亚，中等规模农场在全国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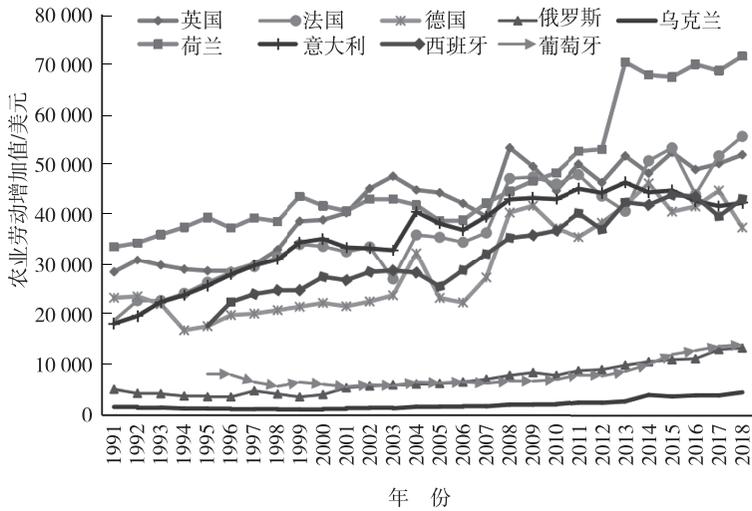


图 3 1991—2018 年欧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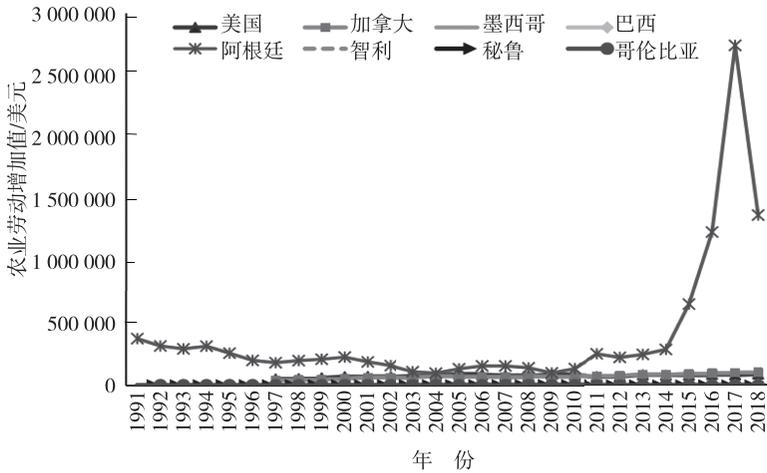


图 4 1991—2018 年美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植面积中所占的份额接近 50%，中等规模农场销售的油籽和园艺作物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这种趋势并非无处不在。在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和卢旺达等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土地稀缺和土地价值高阻碍了中等规模农场收购的步伐，中等规模农场的土地份额增长缓慢，也进一步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增加值的上涨。

大洋洲主要国家农业劳动增加值在 1991—2018 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图 6），年均增长率为 3.5%。其中，澳大利亚农业劳动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4.4%，斐济的年均增长率为 2.6%。斐济以山区和丘陵地形为主，总土地持有量的大部分（56.2%）由面积小于 2 公顷的小型农场组成^[28]，且多数生产初级农产品，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增加值的上升。

总体而言，1991—2018 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呈上升趋势。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农业投入等因素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这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四大法宝^[29]。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力^[30-31]。之后，技术进步成为中国农业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32-33]。基于对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和农业劳动增加值的综合分析发现，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近三十年的农业转型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而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转型出现放缓的现象，转型幅度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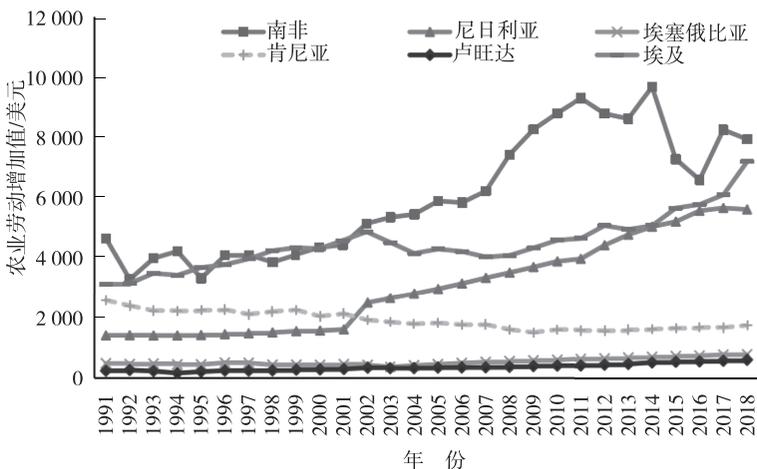


图 5 1991—2018 年非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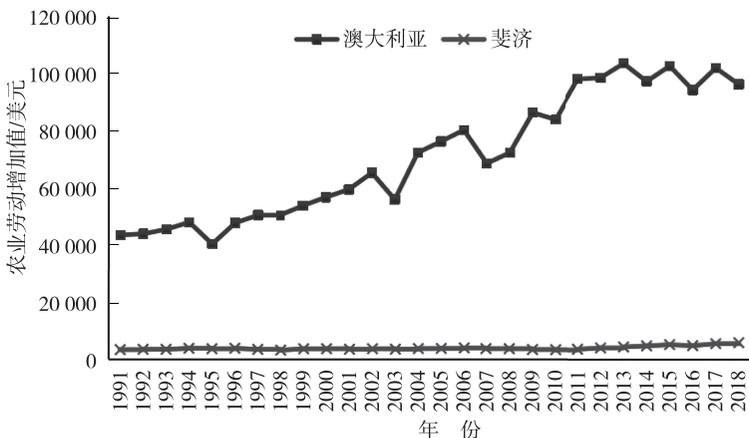


图 6 1991—2018 年大洋洲主要国家的农业劳动增加值

2.2 农村劳动力转型

亚洲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一直持续上升。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维持在 20%~40%, 非农收入占比在 25%~50%^[34]。近年来,亚洲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始终呈现上升趋势^[35-38]。其中,中国在 1991—2018 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为 1.25%, 上升速度最快,越南次之,为 1.19%。日本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0.12%, 上升速度最慢。这表明,过去三十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受到总体结构转型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影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早,其在 1991—2018 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变化不明显。以英国为例,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0.04%, 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基本维持在 98%左右。与之相似,德国和荷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08%和 0.07%, 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均超过了 97%。而增长最快的当属乌克兰,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为 0.39%, 2018 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为 85.6%。可见,英国、德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由于结构转型完成较早,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增长潜力较小,而乌克兰等发展中国家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美洲主要国家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变化差异较大。其中,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

年均增长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如美国、加拿大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02%和 0.07%。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较高,如巴西、智利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38%、0.36%,远高于美国和加拿大。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虽为发展中国家,但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0.01%,原因可能在于阿根廷农牧业发达,其就业结构转型不明显。

非洲主要国家近三十年的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较快。特别是卢旺达,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0.95%,埃及、尼日利亚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64%、0.55%。值得注意的是,肯尼亚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出现负增长,年均减少了 0.39%,表明其工业化进程缓慢,对农业产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大洋洲主要国家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变化差异明显。其中,作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较低,仅为 0.1%;而斐济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0.6%。

总体而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近三十年的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较慢,而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受快速工业化的影响,其农村劳动力转型取得了较大突破。

3 世界主要国家农村经济转型的效果

农村经济转型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一方面,农村经济转型促使农业生产从单一的、低价值的谷类农产品转向多样化的、高价值的农产品(如经济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等)。在保障粮食基本充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满足人们在食物种类、营养上的需求。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促使食品质量和安全获得更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高价值的农产品生产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农村减贫具有积极影响^[1]。这里以农村减贫为例,比较不同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效果差异。

1991—2018年,亚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农村减贫成就在国家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以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 1.9 美元的贫困线为标准,中国和越南是农村减贫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其中,中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90 年的 66.3%下降到 2016 年的 0.5%^①,2020 年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取得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越南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92 年的 52.3%下降到 2018 年的 1.8%。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和韩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基本维持不变或者出现适度反弹。韩国在 2006—2016 年,其农村贫困发生率基本维持在 0.2%左右。日本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2008 年的 0.5%上升到 2013 年的 0.7%。其他亚洲国家在农村减贫方面的成就则介于前面两类国家之间。

欧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变化差异较为明显。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快的国家。其中,俄罗斯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93 年的 3.7%下降到 2018 年的 0%,乌克兰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92 年的 2.7%下降到 2018 年的 0%,减贫效果明显。与之相反的是,英国和德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英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91 年的 0.2%上升到 2017 年的 0.3%,德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从 1991 年的 0%上升到 2008 年的 0.2%。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美洲主要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国家的减贫效果存在差异。以美国和阿根廷为例,其农村贫困发生率不降反升。其中,美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74 年的 0.5%上升到 2018 年的 1%,阿根廷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80 年的 0.5%上升到 2018 年的 1.4%。而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的减贫速度较快,年均减贫率分别为 0.68%、0.51%、0.43%。

非洲主要国家除肯尼亚以外,其他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肯尼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在 1992—2015 年不断增加,从 1992 年的 31.7%上升到 2015 年的 37.1%。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的减贫效

^① 数据来源于 World Bank 数据库,本节同。

果较好。其中，埃塞俄比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95年的69%下降到2015年的30.8%，贫困发生率减少了38.2%。卢旺达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78%下降到2016年的56.5%，贫困发生率减少了21.5%。

大洋洲主要国家，如澳大利亚、斐济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斐济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更快，从2002年的2.3%下降到2013年的0.5%，而澳大利亚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更为缓慢，1981—2014年仅下降了0.5%。

可见，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在过去三十年出现了适度反弹的迹象，以中国、越南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4 世界主要国家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

4.1 农业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负向关系

过去三十年，世界主要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农业转型。图7揭示了农业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负向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非完全的线性关系，但基本遵循“农业转型速度越快，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越快”的共性规律。农业产业结构转型不仅满足了城乡居民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食物需求，也为农村居民增收提供了更多机会。高值农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畜牧产品和水产品）进一步延伸了农业产业链，并通过规模化、绿色化和数字化，提升了农业劳动附加值。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属于低值农产品，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农情下，仅靠生产粮食难以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必须通过大宗农产品与高值农产品的分工协调，才能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增收和降低贫困发生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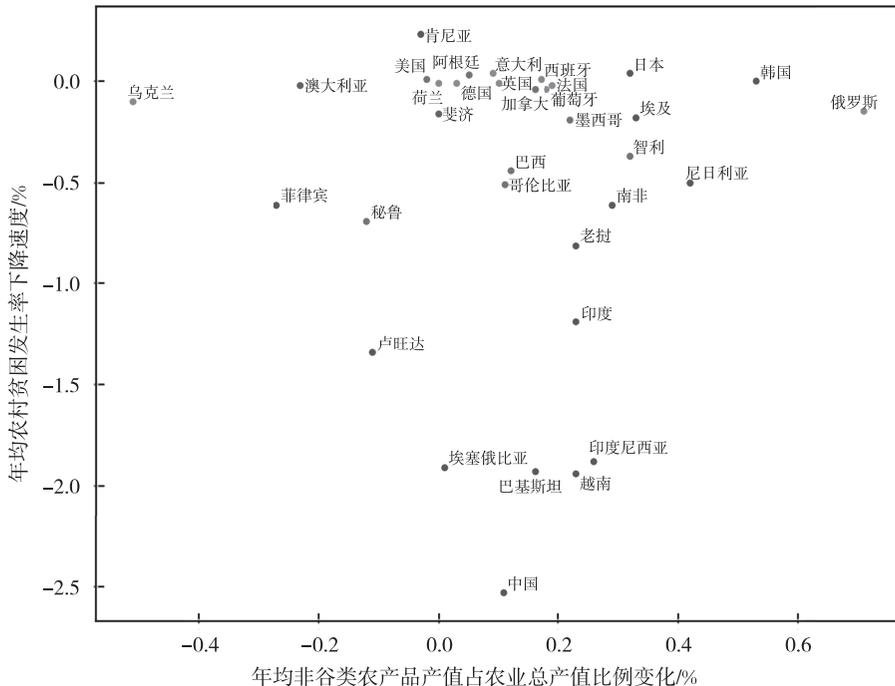


图7 农业转型速度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

例如，越南和巴基斯坦在1991—2018年的年均农业转型速度（或非谷类农产品产值比例变化百分比）分别为0.23%和0.16%，相应的农村减贫速度分别为1.94%和1.93%；菲律宾的非谷类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为负增长，其农村减贫速度在亚洲主要发展中国家中也最低，为0.61%。俄罗斯和德国在1991—2018年的年均农业转型速度分别为0.71%和0.03%，相应的农村减贫速度分别为0.15%和0.01%。美国的非谷类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为负增长，其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不断上升。类似地，肯尼亚的非

谷类农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也为负增长，其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与之相反，随着年均非谷物农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不断增加，智利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趋势，年均减贫速度为 0.37%。可见，农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农村贫困发生率产生负向影响。当然，两者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4.2 农村劳动力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负向关系

发展中国家近三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带动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增加，并随之促进了农村居民增收^[39]，贫困发生率下降。图 8 揭示了农村劳动力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负向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但基本遵循“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越快，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越快”的共性规律。随着产业结构和市场化改革以及城市化等进程加快，农业就业占比和农业 GDP 占比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即工业、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总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其贫困发生率。此外，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加快对于缩小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或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由绝对过剩转为相对短缺，资本开始替代劳动，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当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异消失，城乡收入差异也随之消失，从而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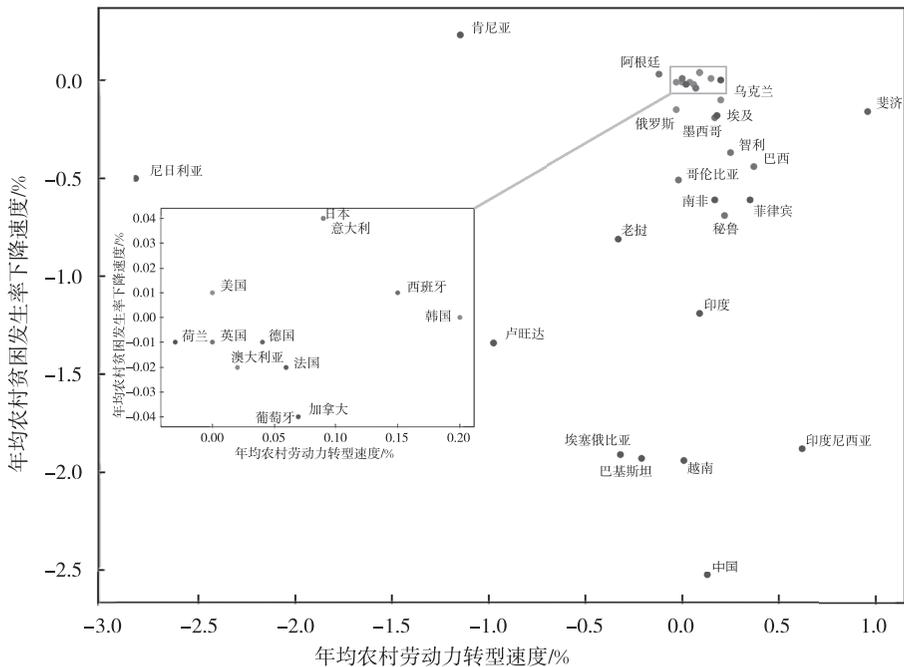


图 8 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和印度的年均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或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变化百分比）分别为 0.13% 和 0.09%，相应的农村减贫速度分别为 2.53% 和 1.19%。葡萄牙和法国的年均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分别为 0.07% 和 0.06%，相应的农村减贫速度为 0.04% 和 0.03%。阿根廷的年均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为负增长，其贫困发生率则不断增加。类似地，肯尼亚的年均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下降了 1.15%，而年均贫困发生率上升了 0.23%，进一步从反面证实了农村劳动力转型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4.3 农村经济转型及其效果的类型分析

基于农业转型速度与农村减贫速度的相关关系（图 7）、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与农村减贫速度的相关关系

(图 8)，本文选取部分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进行类型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型和农业转型都较快的国家（如中国、越南、智利、印度尼西亚），减贫速度也较快，出现减贫速度较慢的可能性小，证实了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第二，农村劳动力转型和农业转型都较慢的国家（如德国、美国、阿根廷、肯尼亚），减贫速度也较慢，出现减贫速度较快的可能性小。第三，对于农村劳动力转型较快而农业转型较慢（如菲律宾、乌克兰、巴西、斐济），或者农村劳动力转型较慢而农业转型较快的国家（如印度、俄罗斯、埃及、尼日利亚），其农村减贫表现为中等的速度，即介于前面两类国家之间（表 1）。以上类型分析结果表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可以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方面入手。前者着眼于农村内部发展，即加快构建绿色高效高值农业的体制机制；而后者更加关注农村外部发展，即借助工业化、城市化为农村发展、农民就业提供契机和经济基础，畅通城乡要素循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表 1 部分国家农业转型、农村劳动力转型与农村减贫效果

类型		农村减贫速度		
		较快	中等	较慢
农村劳动力 转型速度较快	农业转型速度较快	中国、越南、智利、印度尼西亚		
	农业转型速度较慢		菲律宾、乌克兰、巴西、斐济	
农村劳动力 转型速度较慢	农业转型速度较快		印度、俄罗斯、埃及、尼日利亚	
	农业转型速度较慢			德国、美国、阿根廷、肯尼亚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农业转型和农村劳动力转型两个维度解构世界主要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并以农村减贫为例，理清农村经济转型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基于类型学分析，进一步考察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研究发现，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效果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差异，但农村经济转型也存在共性规律。近三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速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尤其在农村劳动力转型方面差异更为明显。制度革新、市场改革、技术应用、土地规模化和城市化等因素是推动农村经济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且农村经济转型速度越快，减贫效果越明显。基于此，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快速和包容发展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内容。

第一，加快农业转型速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未来农业发展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把握质量，引导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提升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价值，建立高质、高效、协同、可持续的农业资源配置机制，发展绿色高效多功能的高值农业，为农户增产增收创造机会，让农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促进共同富裕。同时，应树立“大食物观”，从“粮食安全观”向“食物安全观”转变，从更广阔的视角把握粮食安全，建设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国家安全食物保障体系，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

第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型速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加快农村劳动力转型，仅靠农业内部生产力提升，难以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2018 年中国农业 GDP 占比降到了 7%，但农业就业占比仍高达 26%；预计到 2035 年，农业的 GDP 占比将下降至 5% 左右，到时农业就业占比需降到 8% 左右，甚至更低。为此，一方面，应完善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创新培育机制，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提升农民经营、管理、技术等能力，支持高素质农民创新创业，以农业内部创业带动剩余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应持续推进总体经济结构转型，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工业化、县域城镇化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大幅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非农行业之间的差距，进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 构建与农村经济转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农村经济转型阶段差异明显, 每个阶段有其特定的制度安排、政策支持和投资重点。对于中国而言, 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差异显著, 乡村振兴应在尊重农村经济转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 明确各地目前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处的阶段,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体系, 不断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 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 [1] 黄季焜. 乡村振兴: 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和政府职能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1): 4-16.
- [2] 严海蓉, 陈义媛. 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 [J]. 开放时代, 2015 (5): 49-69.
- [3] 陈航英. 中国的农业转型: 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0 (3): 69-78.
- [4] ZHANG Q F, DONALDSON J A. The ris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business and collective land rights [J]. The China Journal, 2008, 60: 25-47.
- [5] 黄宗智, 高原, 彭玉生.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中国的农业发展 [J]. 开放时代, 2012 (3): 10-30.
- [6] 郭亮. 劳动力成本: 规模经营的结构限制: 基于对林镇规模农业的调查 [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2 (3): 15-20.
- [7] 贺雪峰. 小农立场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 [8] 黄季焜, 陈丘. 农村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9, 18 (6): 709-716.
- [9] 刘震.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乡村振兴路径分析: 基于日本乡村建设的实践及其经验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 (12): 76-79.
- [10] 贾磊, 刘增金, 张莉侠, 等. 日本农村振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8, 39 (30): 359-368.
- [11] 刘松涛, 罗炜琳, 王林萍. 日本“新农村建设”经验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J]. 农业经济, 2018 (12): 41-43.
- [12] JANG H, YUN J K. Comprehensive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Kore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Rural Development, 2016, 39 (Special Issue): 1-34.
- [13] YANG J.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visiting South Korean rural modernization of the 1970s [J].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018, 53 (1): 61-77.
- [14] 田毅鹏.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35 (3): 23-28.
- [15] 龙晓柏, 龚建文. 英美乡村演变特征、政策及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38 (4): 216-224.
- [16] 陈仁安. 英美农村区域规划经验及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J]. 世界农业, 2018 (6): 24-28.
- [17] REARDON T, STAMOULIS K, PINGALI P. Rural nonfarm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7, 37: 173-183.
- [18] CHRISTIAENSEN L, WEERDT J, TODO Y. Urbaniz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 role of rural diversification and secondary towns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3, 44 (4/5): 435-447.
- [19] REARDON T, TIMMER C P. Five interlinke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Asian agrifood economy: food security implications [J]. Global Food Security, 2014, 3 (2): 108-117.
- [20] FIAIKOWSKA K, PIECHOWSKA M. New way, old pattern. Seasonal migration from Poland to Germany [J]. Arbor, 2016, 192 (777): 287.
- [21] RYE J F, SCOTT S.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and food production in rural Europe: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J]. Sociologia Ruralis, 2018, 58 (4): 928-952.
- [22] VANDERCASTELEN J, BEYENE S T, MINTEN B, et al. Cities and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Ethiopi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5: 383-399.
- [23] REARDON T, BEREUTER D, GLICKMAN D. Growing food for growing cities: transforming food systems in an urbanizing world [J].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6: 27.
- [24] TSCHIRLEY D, REARDON T, DOLISLAGER M, et al. The rise of a middle class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food system transform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5, 27 (5): 628-646.
- [25] DJURFELDT A A. Urbanization and linkages to smallholder farm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 [J]. Global Food Security, 2015, 4: 1-7.
- [26] FUGLIE K O, WANG S 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lobal agriculture shift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choices [J]. Agricul-

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12, 27 (4): 1-7.

- [27] JAYNE T S, MUYANGA M, WINEMAN A, et al. Are medium-scale farms driv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9, 50: 75-95.
- [28] KUMAR S, BHATI J 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businesses in Fiji [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Rural Development*, 2011, 21 (2): 19-38.
- [29] 黄季焜. 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 (3): 4-15.
- [30] LIN J.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 34-51.
- [31] HUANG J, ROZELLE S. Technological change: rediscovering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1996, 49: 337-369.
- [32] JIN S, HUANG J, HU R, et al. The creation and spread of technolog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s agriculture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2, 84 (4): 916-939.
- [33] JIN S, MA H, HUANG J, et al.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change: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transforming agriculture [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10, 33: 191-207.
- [34] BANK A D. Rural Asia: beyond the Green Revolution [J]. *Rural Asia Beyond the Green Revolution*, 2000, 27 (5): 133-136.
- [35] HEADEY D, BEZEMER D, HAZELL P B.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rends in Asia and Africa: too fast or too slow?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0, 25: 57-89.
- [36] WANG X, HUANG J, ZHANG L, et al. The rise of migration and the fall of self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s labor market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 4: 573-584.
- [37] HOANG T X, CONG S P, ULUBASOGLU M A. Non-farm activity, household expenditur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vietnam: 2002-2008 [J]. *World Development*, 2014, 64: 554-568.
- [38] IMAI K S, GAIHA R, THAPA G. Does non-farm sector employment reduce rural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Evidence from Vietnam and India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5, 36: 47-61.
- [39] 黄季焜, 史鹏飞. 快速和包容的农村经济转型路径、效果和驱动力 [J]. *中国科学基金*, 2021, 35 (3): 394-401.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mparison, Law and Policy Enlightenment of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QIU Hailan DENG Hanyun LIAO Wenmei

Abstract: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related to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ch has its common rul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rural economic transition data of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1991 to 2018,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conomic transition stag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transition and rural labor transition, and takes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its transformation effects. On this basis, it carries out typology research on rural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reveals the general law of rural economic transi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speed of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generally been higher than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Factors such as institutional reform, market reform, technology application, land scale, and urbanization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oreover, the faster the speed of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more obviou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ccelerate the speed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suitable for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rural economy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Path; Transformational Effect

食物供能结构视角下俄乌冲突 对非洲粮食安全影响的探析

◆ 翟天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鉴于非洲居民独特的饮食结构,在考察俄乌冲突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时,有必要结合各类食物给居民提供能量的情况来做讨论。以非洲各国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作为基础考察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接近半数的非洲国家,其居民食物中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较低,在其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俄乌冲突不会对其粮食安全造成显著的影响。实际上,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受俄乌冲突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埃及等食物能量供能对外依存度较高且粮食购买力较差的国家。基于此,中国可尽快对居民饮食能量供给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购买力不足的非洲友好国家予以一定的粮食和资金援助。进一步地,加强对非洲友好国家的农业技术援助,分享农业发展经验,并扩大在非洲的贸易合作伙伴范围,为保障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更有效地贡献中国力量,从而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关键词: 俄乌冲突; 非洲粮食安全; 食物能量供应比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3.08.003

1 引言

粮食安全问题是多年来非洲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粮食安全定义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积极健康生活的饮食需求和食物偏好^[1]。这也是当下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和采用的粮食安全的概念,亦即食物安全^①。尽管近几十年来,非洲在与贫困的斗争中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长、持续不断的区域内部冲突和难民危机等,一部分非洲居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非洲居民难以获得维持温饱水平所需的食物量,粮食安全更无从谈起^[2]。此外,加上近年来的气候变化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新冠疫情的暴发和蔓延,使得非洲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趋于恶化^[3]。FAO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非洲地区处于重度食物

收稿日期: 2023-02-02。

基金项目: 中国非洲研究院 2022 年度应急热点课题“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CAI-E2022-08)。

作者简介: 翟天昶(1992—),男,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 食物消费、农产品政策, E-mail: zhaitch@cass.org.cn。

① 与下文提到的传统的粮食安全概念相对应。

② FAO将食物安全程度设定为食物安全或轻微不安全、中度食物不安全、重度食物不安全三个级别。其中,重度食物不安全是指人们可能会耗尽粮食,经历饥饿,甚至是几天吃不到食物,使他们的健康和生活面临严重风险^[4]。2014年起,食物安全程度指标是由FAO基于食物不安全经历量表(Food insecurity experience scale, FIES)获取数据,并使用Rasch测量模型进行测算得到^[5]。

不安全^②和饥饿的人数在不断增长。2021年非洲重度食物不安全人数为3.2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3.4%)，其中有2.78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即营养不足发生率^①为20.2%)正在饱受饥饿的困扰^②。因而，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实现充足供能所需的食物量，即战胜“饥饿”，仍是当下非洲粮食安全的阶段性目标^[6]。

俄乌冲突的爆发，给非洲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历史经验表明，地缘冲突会造成粮食贸易中断^[7]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8]，从而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当今粮食和能源贸易大国，其冲突产生之后，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许多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了管制措施，这使得小麦、玉米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一度达到历史高位^[9-12]。在此情况下，非洲作为粮食安全情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其粮食安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已有研究虽在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上展开了一定的讨论，但关于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却缺乏必要的关注。为评估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对非洲地区小麦、玉米、葵花油等俄乌两国出口主要农产品相关贸易指标的考察无疑是必要的^[13]。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因地域文化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不同存在一定差异^[14]。具有地域特色的土著和传统食物(Indigenous traditional food, IFP)^③在许多国家居民的饮食结构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国家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中，如果只侧重少数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等狭义的粮食安全所涉及的谷物品类^④)，容易造成结论的局限性和偏误^[16-17]。因此，仅依据俄罗斯、乌克兰出口主要农产品的相关贸易指标，可能不足以充分认识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还需要结合非洲各国饮食结构下各类食物的供能占比情况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研究的目标是立足于不同类别食物的供能情况，评估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为保障俄乌冲突下非洲的粮食安全提供新的判断依据。具体来讲，本文将重点对近年来非洲各国居民饮食结构下各类食物的能量供应占比和进口依赖程度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讨论对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行研判。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中国援助方案来协助保障非洲的粮食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本文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地缘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提供新的研判思路，加深关于地缘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影响的认识，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来更好地为保障当下和未来非洲的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非洲各国饮食结构下的食物能量供应比

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均可对人体提供能量^[18]。不同食物可以提供的营养素类别存在天然的差异，单位数量的不同食物的供能也因营养素含量及其供能系数^⑤的不同存在着差别^[19]。因而，不同的饮食习惯下，各类食物的供能占比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决定了不同国家居民对不同食物的供能依赖程度有所不同。接下来，本文将对当前非洲各国各类食物为居民提供能量的占比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从能量供给的角度考察非洲不同国家居民对各类食物的依赖程度。

本节所使用的数据来自FAO数据库的食物平衡表(Food Balances)板块。该板块将食物种类划分成20

① 营养不足人数(Number of people undernourished)和营养不足发生率(Prevalence of undernourishment, PoU)衡量的是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数情况。所谓“饥饿”状态，是指由所需膳食能量不足引起的不舒适或痛苦的身体感觉。营养不足属于营养不良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营养不良还包括营养过剩和微量元素摄入不足^[1]。

② 从衡量标准上，重度食物不安全与营养不足两个指标较为相近。虽然二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数据来源都不同，但在衡量全球粮食安全方面可以相互补充和验证。

③ 即通常所说的本土食物。

④ 狭义的粮食安全仅指谷物“Cereal grain”的安全^[15]。

⑤ 用以衡量单位质量营养素可以在人体内被转化成的能量。

多个大类、90 多个小类, 提供了全球近 300 个国家(地区)居民日常饮食能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来源(即食物供给人体的日常能量、蛋白质和脂肪), 以及各类食物的生产、进出口和消费情况, 其数据主要来源于 FAO 基于各国统计部门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部分则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科学的估算过程得到^[20]。因此, FAO 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比较适合该部分研究的需要。

从整体情况来看, 非洲地区居民能量的摄取来源主要是植物性食物, 动物性食物能量供应占比不足 10% (图 1), 饮食结构较为单一。因此, 本文仅对非洲各国家居民植物性食物的供能情况予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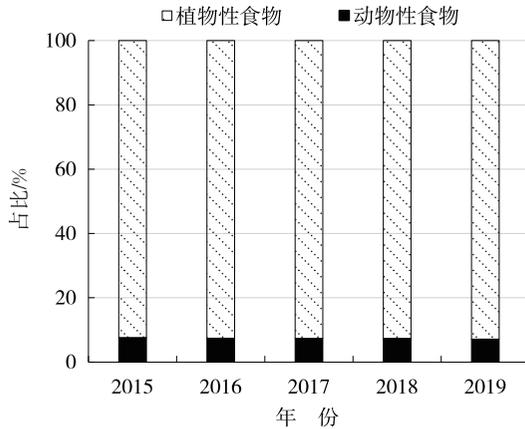


图 1 2015—2019 年非洲居民日常饮食中动物性和植物性食物能量供应平均占比

根据 FAO 数据库的分类标准, 植物性食物被划分成谷物、蔬菜、水果、豆类、植物油、油料作物、糖和甜味剂^①、糖料作物、淀粉根类食物、香料作物、坚果、酒精饮料、非酒精类兴奋剂(包括茶叶、咖啡豆和可可等) 13 大类。接下来, 本文重点考察的是非洲各国谷物、淀粉根类食物、水果、植物油、油料作物、豆类这 6 类食物的供能情况。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 谷物是传统的能量供应食物, 而且小麦、玉米等俄乌两国主要出口的粮食品类均包含其中。第二, 以香蕉为代表的热带或亚热带水果、木薯和马铃薯等淀粉根类食物以及豆类, 在许多非洲国家居民日常饮食结构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是非洲地区居民饮食习惯的一大特色^[21-22]。根据 FAO 统计数据, 非洲地区淀粉根类食物的人均消费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以上, 豆类的人均消费量也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三, 其他几类食物, 非洲地区的人均消费量相对较低, 且不属于传统的能量供应食物。方便起见, 本文没有对其在非洲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结构中的情况予以考察。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以谷物为代表的植物性食物供能仅指的是直接渠道, 即通过被人体直接食用来提供的能量, 不包括通过饲用渠道来间接提供能量的部分。

从非洲各国主要类别食物给居民提供的能量占比情况来看(图 2), 在半数以上的非洲国家, 谷物的直接能量供应占比不足 50%, 地处非洲中部和南部的国家几乎如此。诸如布隆迪、中非和刚果(金)等国家, 其居民食物供能结构中, 谷物供能占比甚至不足 20%。相比之下, 对这些国家的居民而言, 淀粉根类食物、水果和豆类的供能占比加总值已经超过谷物, 木薯、香蕉等传统和土著食物是当地居民主要的食物供能来源。可以说, 土著食物是这些国家居民的主食。此外,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与全球大部分国家所不同的是, 由于动物性食物在非洲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结构中的占比较低, 谷物的饲用占比自然也不高, 谷物对当下非洲居民的能量供应主要是通过直接摄入而非通过摄入动物性食物来间接消费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 从能量供应的角度,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 非洲居民对于谷物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① 指的是 Sugar & Sweetener, 包括蔗糖和蔗糖之外的淀粉糖、果糖等其他甜味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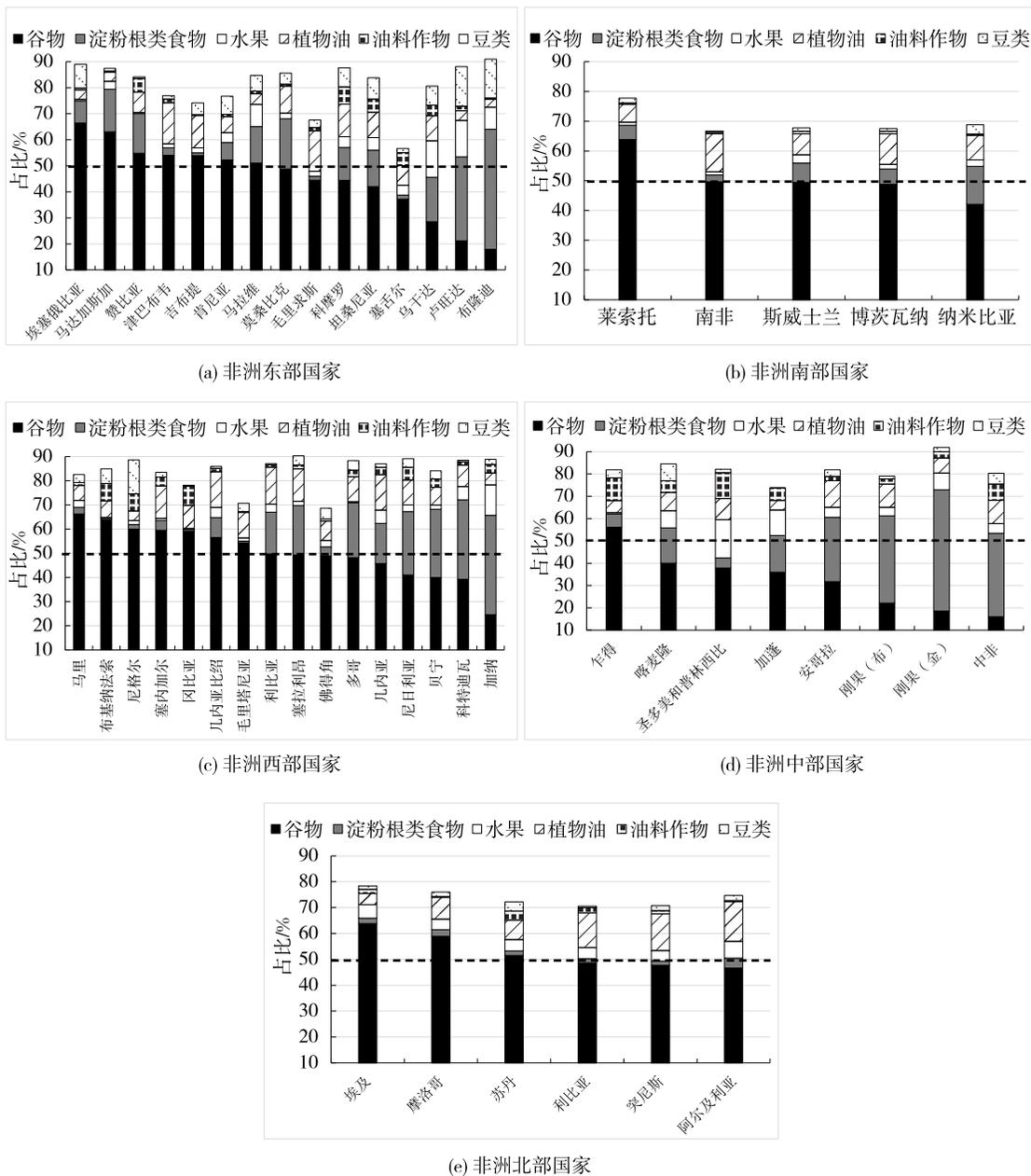


图 2 2015—2019 年非洲各国主要类别食物为居民提供的能量占比均值
 数据来源：笔者计算。

注：图中数据为 2015—2019 年人均食物供能占比的年平均均值。供能占比由各类食物供能量除以食物总供能量得出。

3 非洲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的对外依赖程度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近年来非洲各国对各类食物的对外依赖程度，从而结合非洲各国居民日常饮食结构下各类食物的功能情况，来分析非洲各国饮食结构下食物能量供应的对外依赖程度，以为俄乌冲突对非洲居民粮食安全的影响提供进一步的判断依据。

3.1 非洲各国对各类食物的对外依赖程度

对于进口依赖程度的考察,本文所选用的是净进口依存度这一指标,该指标常被用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中考察粮食的对外依存度^[23]。计算该指标所基于的数据同样来自 FAO 数据库的食物平衡表(Food Balances)板块。需要说明的是,许多非洲国家的粮食总供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援助,因而在考察非洲地区各类食物的对外依存度时,只考虑通过国际市场上购买而“进口”的食物进口量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偏差。考虑到这一点,FAO 的统计口径中将国际援助也算作进口^[24]。基于此,与以往许多研究所不同的是,对于净进口依存度,本文的计算方式是(净进口量/总消费量)×100%,而非(净进口量/表观消费量)×100%。其中,结合 FAO 数据库中食物平衡表的数据指标,总消费量的计算方式是消费统计法,即通过加总计算直接消费、饲用消费、工业消费、种用消费及运输储存过程的损耗 5 种类型的食物消费,来求得一国或地区某类食物的总需求量。

根据表 1 的结果可以看出,非洲大部分国家的谷物自给率不足 90%,半数以上国家不足 80%。如果基于狭义的粮食安全口径,即谷物安全的视角来看,多数非洲国家粮食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会对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严重加剧其食物不足人数的比例。

表 1 2015—2019 年非洲各国主要食物净进口依存度均值

单位:%

国家		谷物	淀粉根类食物	水果	植物油	油料作物	豆类
东部	吉布提	100.0	100.0	87.1	100.0	100.0	91.7
	塞舌尔	100.0	100.0	62.5	-33.3	100.0	100.0
	毛里求斯	99.7	46.1	53.4	73.1	91.2	100.0
	科摩罗	68.3	0.9	6.1	0.8	40.8	4.7
	莫桑比克	46.5	0.4	-9.6	-11.9	45.8	-8.2
	肯尼亚	42.4	0.4	-3.4	12.1	40.9	-3.1
	津巴布韦	38.0	1.7	-12.7	24.1	62.3	15.4
	卢旺达	36.7	19.0	0.4	29.7	92.6	3.2
	马达加斯加	20.6	-0.1	-2.7	-27.4	80.0	-83.6
	布隆迪	18.3	-1.6	0.0	4.4	9.9	-9.2
	马拉维	14.3	-0.1	0.2	-16.4	18.4	-22.6
	乌干达	3.2	-8.4	0.1	-6.4	56.0	-23.0
	赞比亚	-0.8	-45.7	22.3	13.8	52.4	2.5
	坦桑尼亚	-6.8	-9.9	-0.6	-21.0	27.0	-22.2
埃塞俄比亚	-23.7	-2.0	2.0	-49.3	64.2	-8.6	
南部	博茨瓦纳	90.3	19.0	89.6	78.4	100.0	32.3
	莱索托	73.2	2.1	56.3	100.0	91.4	52.7
	纳米比亚	73.0	6.1	33.8	100.0	100.0	7.9
	斯威士兰	62.9	11.2	-26.6	62.1	100.0	54.5
	南非	17.9	-8.9	-99.9	8.0	34.3	31.2
西部	佛得角	95.4	41.6	46.8	3.3	100.0	30.6
	冈比亚	63.6	27.6	26.1	-7.0	26.3	0.0
	毛里塔尼亚	60.2	83.0	57.8	29.4	100.0	5.6
	利比里亚	55.6	0.6	0.7	0.9	28.6	23.1
	塞拉利昂	38.4	0.1	0.4	0.5	9.1	3.7

(续)

国家		谷物	淀粉根类食物	水果	植物油	油料作物	豆类
西部	科特迪瓦	38.0	0.0	-20.5	-7.2	-133.6	4.0
	塞内加尔	37.8	1.3	17.7	-47.9	14.2	-35.3
	几内亚比绍	34.1	15.1	-1.2	-1.3	-2.4	-5.3
	贝宁	31.2	-14.5	2.9	-28.7	-35.3	-18.0
	加纳	28.4	-11.3	-0.6	0.5	-118.4	-14.4
	几内亚	19.1	-2.3	0.3	-10.3	10.0	5.3
	多哥	16.9	-1.6	3.0	-1.5	-49.9	-29.6
	尼日利亚	15.7	-21.8	0.5	0.2	13.7	-8.9
	尼日尔	10.7	-11.7	4.8	1.2	60.9	-16.1
	布吉纳法索	10.0	11.1	-1.3	-18.9	35.8	-1.7
	马里	-25.9	-4.7	1.1	-11.2	10.2	-7.1
中部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94.7	3.0	1.9	-5.7	-150.0	100.0
	刚果(布)	91.8	0.3	2.0	1.5	32.2	40.2
	加蓬	84.9	0.0	2.9	4.1	0.0	0.0
	安哥拉	41.9	0.2	0.8	-2.8	73.3	11.2
	喀麦隆	24.9	-4.9	-8.1	-1.3	-76.9	-1.5
	中非	24.4	0.5	0.8	-13.5	14.1	5.2
	刚果(金)	17.6	0.0	0.1	2.3	26.6	2.2
	乍得	5.0	1.1	2.0	-12.3	-4.7	-5.4
北部	利比亚	90.5	-36.0	23.0	5.3	84.1	56.1
	阿尔及利亚	70.6	-7.9	6.2	6.9	83.6	66.5
	突尼斯	67.5	8.9	-7.5	33.3	-28.7	9.6
	埃及	45.2	-8.9	-17.7	64.5	10.6	54.7
	摩洛哥	42.8	4.0	-15.0	1.8	50.1	6.6
	苏丹	13.0	2.7	0.8	-121.3	23.3	-4.7

注：表中数据为 2015—2019 年人均食物供能占比的年平均值得。

3.2 非洲各国居民食物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

进一步地，虽然非洲国家的谷物安全总体上存在较高的风险，但对于大部分国家，淀粉根类食物、水果和豆类的对外依存程度相对较低（表 1），这也反映出这三类食物在非洲的土著特征。结合各国饮食结构下的食物供能占比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以土著食物作为主食的非洲国家，由于谷物在居民日常饮食能量供应结构中的占比相对较低，居民饮食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并不高（表 2），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这些国家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因而，对这部分国家而言，仅考察谷物对外依存度情况，容易误判俄乌冲突对其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

具体来看，根据表 2 的结果，1/3 以上的非洲国家，外来（国际市场购买和接受援助）的谷物量给居民所提供的能量在食物总供能中的比例不足 10%，约半数不足 20%。诸如卢旺达、加纳、刚果（布）、安哥拉、中非等国家，尽管其谷物的对外依存度超过了 20%（表 1），但由于谷物所提供的能量在其居民饮食总供能中的占比较低，因而这些国家居民外来谷物的能量供应占比大多不足 10%。此外，诸如图 2 中马里、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尽管谷物供能占比相对较高（超过 50%），但由于其谷物进口量较少，

因而谷物乃至食物整体供能的对外依存度较低。考虑到植物油、油料作物也是俄乌主要出口的农产品，本文将谷物、植物油和油料作物三类食物外来部分供能占比加总后，结果依然变化不大。一方面，在非洲的饮食结构下，这三类食物的供能占比本就不高；另一方面，则是许多非洲国家植物油和油料作物的对外依存度较低（表 1）。此外，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所述，各国居民的饮食习惯与自然禀赋有着很大的关联，对以淀粉根类食物、水果和豆类作为主食的国家而言，这三类土著食物的进口依赖程度必然较低。而对于不以此三类食物作为主食的国家，由于不同食物能量供应的功能替代关系，这三类食物的供能占比均处于较低水平，外来供应部分的供能占比自然也不高。

综上所述，根据近年来非洲居民饮食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情况，可以初步判断的是，约半数的非洲国家，在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下，其粮食安全状况可能不会有明显变化。

表 2 2015—2019 年进口的主要类别食物给各国居民提供的能量占比

单位：%

国家		谷物	淀粉根类食物	水果	植物油	油料作物	豆类	谷物、植物油和油料作物加总
东部	吉布提	54.0	1.1	1.7	0.3	12.4	4.2	66.6
	毛里求斯	44.4	0.8	1.1	0.9	14.7	2.9	60.1
	塞舌尔	37.2	1.6	2.6	1.1	7.6	1.6	45.9
	科摩罗	29.3	0.3	0.4	0.0	5.9	0.3	35.3
	莫桑比克	23.1	0.2	0.0	0.0	6.8	0.0	29.9
	肯尼亚	22.4	0.0	0.0	0.1	3.9	0.9	26.5
	津巴布韦	20.1	0.1	0.0	0.3	9.7	0.3	30.1
	马达加斯加	11.3	0.0	0.0	0.0	3.2	0.0	14.5
	卢旺达	6.9	2.0	0.1	0.6	3.5	0.0	10.9
	埃塞俄比亚	5.5	0.0	0.0	0.0	2.9	0.0	8.3
	马拉维	4.1	0.0	0.0	0.0	1.6	0.0	5.7
	布隆迪	3.3	0.1	0.0	0.0	1.1	0.1	4.4
	坦桑尼亚	2.5	0.0	0.0	0.0	4.8	0.0	7.4
	乌干达	1.5	0.0	0.0	0.0	6.2	0.0	7.7
赞比亚	0.0	0.0	0.1	0.0	4.6	0.0	4.6	
南部	莱索托	46.8	0.4	0.6	0.5	5.6	0.9	52.9
	博茨瓦纳	44.1	0.9	1.5	0.7	10.3	0.0	55.0
	斯威士兰	31.1	0.9	0.0	0.6	7.1	0.7	38.8
	纳米比亚	30.7	0.8	0.9	0.4	8.3	0.3	39.4
	南非	8.9	0.0	0.0	0.0	6.6	0.1	15.5
西部	佛得角	46.7	1.6	1.4	0.1	8.1	1.5	54.9
	冈比亚	37.6	0.2	0.1	0.0	7.3	0.0	44.9
	毛里塔尼亚	32.7	0.5	0.8	0.1	10.5	0.1	43.3
	利比里亚	27.7	0.1	0.0	0.0	4.9	0.2	32.5
	塞内加尔	22.5	0.3	0.2	0.0	5.6	0.2	28.1

(续)

国家		谷物	淀粉根类食物	水果	植物油	油料作物	豆类	谷物、植物油和油料作物加总
西部	几内亚比绍	19.3	0.1	0.0	0.0	4.4	0.1	23.7
	塞拉利昂	18.9	0.0	0.0	0.0	3.0	0.0	21.9
	科特迪瓦	14.9	0.0	0.0	0.0	0.0	0.0	14.9
	贝宁	12.5	0.0	0.0	0.0	4.1	0.0	16.6
	几内亚	8.7	0.0	-0.1	0.0	4.5	0.0	13.2
	多哥	8.2	0.0	0.0	0.0	4.1	0.0	12.2
	加纳	7.0	0.0	0.0	0.0	1.2	0.1	8.2
	尼日尔	6.4	0.1	0.1	0.2	2.5	0.0	9.1
	尼日利亚	6.4	0.0	0.0	0.0	4.2	0.0	10.7
	布吉纳法索	6.4	0.1	0.0	0.0	2.6	0.0	9.0
	马里	0.0	0.1	0.1	0.1	2.8	0.0	2.9
中部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35.9	0.0	0.3	0.0	3.5	1.6	39.5
	加蓬	30.5	0.2	0.4	0.3	3.7	0.0	34.5
	刚果(布)	20.3	0.1	0.1	0.0	7.1	0.5	27.5
	安哥拉	13.3	0.1	0.0	0.0	8.9	0.4	22.2
	喀麦隆	10.0	0.0	0.0	0.0	0.3	0.0	10.3
	中非	3.9	0.0	0.0	0.0	1.7	0.3	5.7
	刚果(金)	3.3	0.0	0.0	0.0	2.0	0.1	5.2
	乍得	2.8	0.0	0.0	0.0	0.1	0.0	2.9
北部	利比亚	44.0	0.1	1.0	0.2	11.7	0.3	55.9
	阿尔及利亚	32.9	0.1	0.4	0.1	13.1	1.4	46.1
	突尼斯	32.2	0.1	0.0	0.4	0.0	0.2	32.6
	埃及	28.9	0.0	0.0	1.0	2.8	0.7	32.7
	摩洛哥	25.3	0.0	0.0	0.0	6.2	0.3	31.4
	苏丹	6.7	0.0	0.0	0.0	2.9	0.3	9.6

注：根据 FAO 的统计口径，进口包括国际粮市场的商业购买和国际援助两部分。表中结果由 2015—2019 年分国家各类食物供能占比（均值）乘以各类食物的净进口依赖度（均值）计算得到；在计算时，考虑到结果的实际意义，各类食物中净进口依存度为负的统一取 0。

3.3 进一步讨论

3.3.1 国际化肥和能源市场波动对非洲农业生产的影响

俄乌两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化肥和能源出口国。自两国冲突开始，与小麦、玉米、油料作物和植物油等农产品一样，两国的化肥和能源出口也受到限制。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两国对全球化肥和能源供应的减少将会抬高全球化肥和能源价格，这可能会对全球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9]。

但对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较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农业生产者对化肥的购买，因而其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使用量较少^[25]，非洲单位土地施肥量总体上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 3）。此外，非洲国家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普遍较为低下^[26]，农业生产对机械和能源的依赖程度也因此较低。尽管不依靠化肥和机械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使许多非洲国家农业生产效率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27]，但也使得国际化肥和能源市场波动对非洲国家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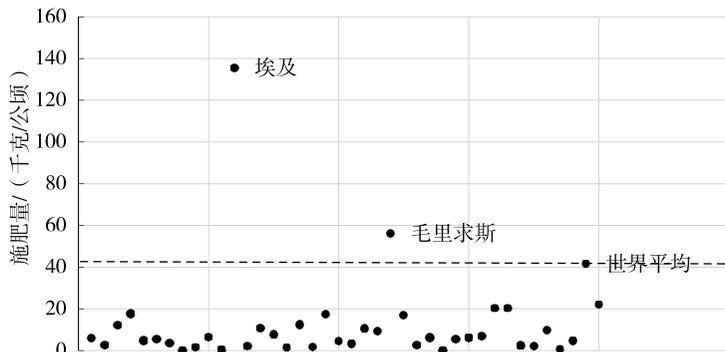


图3 2018—2020年非洲各国及世界平均单位土地施肥量

数据来源：FAO数据库。

注：图中数据为2018—2020年单位土地施肥量的年平均值。

3.3.2 非洲国家粮食购买力评价

基于前面的分析，对于半数食物能量供给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非洲国家而言，俄乌冲突引致的国际粮食市场上粮食价格的提高可能会给其粮食安全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事实上，如果这些国家财务状况较为健康，在进口粮食价格升高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可以维持原有粮食进口量的购买力，俄乌冲突便对其没有过多影响。因而，有必要对非洲国家的粮食购买力进行评价，这有助于更为准确地评判俄乌冲突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贸易净额（BoP）和外债总额存量（DoD）这两个反映一国财务健康状况的常用指标来对非洲国家的粮食购买力进行评价，所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根据图4的结果，近年来非洲大多数国家都有着几亿到几十亿美元不等的贸易赤字，诸如尼日利亚和埃及等国家的贸易赤字甚至达到了200亿美元以上。此外，非洲各国也或多或少的背负了一定数额的外债，个别国家（埃及和南非）近年平均外债数额高达上千亿美元（图5）。从上述情况来看，非洲国家的财务健康状况较差，购买力较低，应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涨风险的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半数食物能量供给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非洲国家，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冲击将会减少其在国际市场上通过购买获得的粮食供应量，其粮食不安全状况可能会因此进一步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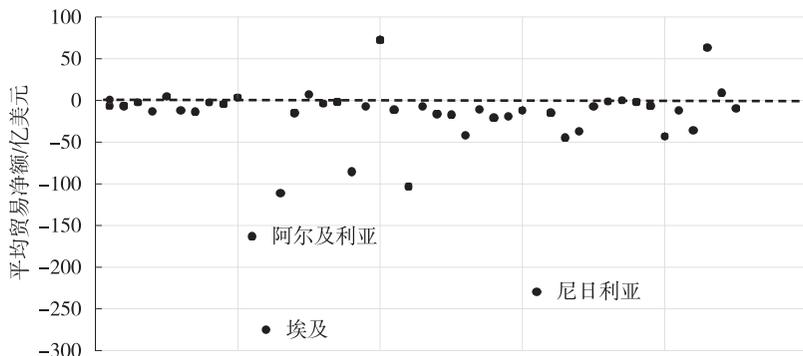


图4 2018—2020年非洲各国平均贸易净额

注：图中所统计的为非洲各国货物及服务贸易净额增加值，即货物和服务的总进口额减去总出口额；部分国家因缺少2019年或2020年数据，因此图中结果仅为有数据年份，该国净货物和贸易总额平均值；诸如刚果（布）等少数非洲国家，因没有相应数据，其贸易净额情况便没有在图中予以呈现。

3.3.3 俄乌冲突下的国际粮食援助

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原有的国际粮食援助会有所减少^[28]。对于那些食物能量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而言，由于其财务状况较差，粮食购买力不足，国际粮食援助则成为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俄乌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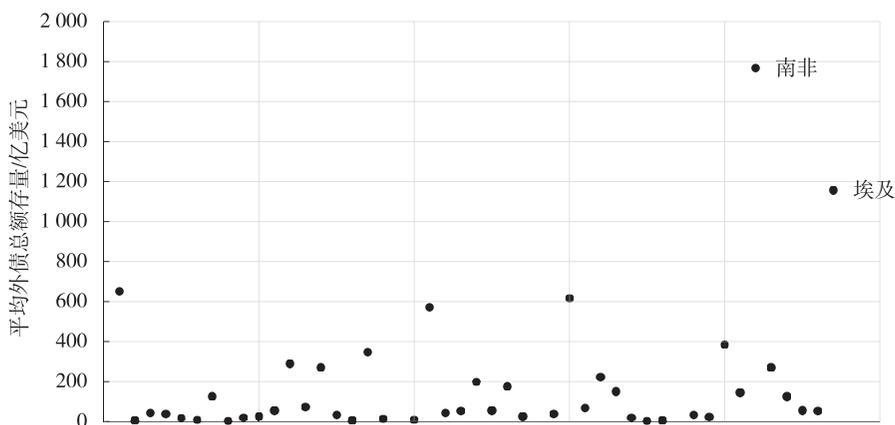


图 5 2018—2020 年非洲各国年平均外债总额存量

注：部分国家（塞舌尔、莱索托、利比亚、斯威士兰等）因缺少相应数据，因而其年平均外债总额存量便没有在图中汇报。

突引致的国际粮食援助的减少，将使其在粮食购买力恶化的情况下，导致粮食外来供应进一步减少，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所幸的是，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采取诸如提供资金援助等方式来帮助粮食供应受影响程度较大的国家应对粮食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粮食援助的减少，有助于降低俄乌冲突对非洲国家整体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

4 俄乌冲突背景下保障非洲粮食安全的策略

由于非洲国家的饮食习惯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独特，在评判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冲突事件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时，如果忽略了这些特殊性内容而仅基于大宗商品的贸易指标来进行讨论，容易放大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影响，造成一定程度的偏误性判断。为此，本文对近年来非洲国家居民饮食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情况进行考察，并结合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讨论国际化和能源市场波动对非洲国家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上述内容，评估俄乌冲突对非洲各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接近半数的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不会受到俄乌冲突的显著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那些食物供能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购买力低下的非洲国家。

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多数非洲国家只能依靠低机械化水平和低化肥投入量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力较低，无法生产出足够多的食物来有效满足居民日常生存的能量需求。而与此同时，许多非洲国家居民因收入水平低下，本就难以承受商品市场上的食物价格，这使得木薯、香蕉等土著食物仍是相当一部分非洲国家居民饮食习惯下的主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洲国家居民饮食能量供应的对外依存度必然较低。尽管俄乌冲突会对全球粮食、化肥和能源市场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但却不会对使用多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产生过多影响。实际上，受影响较大的是那些食物能量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并且购买力不足的非非洲国家，比如莱索托、利比亚和冈比亚。相比之下，同样作为突发性因素，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新冠疫情对当下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更大^[24]。

在这种情况下，本着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保障非洲的粮食安全，中国可采取如下的策略。

4.1 对于粮食供给受影响程度较大的非洲国家，应在能力范围内尽快予以援助

基于前文的分析，粮食安全明显受到俄乌冲突影响的非洲国家数量相对有限。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非洲国家整体上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粮食产量不足，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一部分食物供能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而言，其粮食不安全状况会有一定程度的恶化。因而在短期内，中国可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尽快对非洲友好国家提供粮食或者资金援助，以帮助其缓解俄乌冲突给其粮食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

4.2 加强对非洲友好国家的农业技术援助，分享农业发展经验

从长远来看，非洲国家还需更多依靠自身的发展，这一方面需要依靠外来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需要自身制度和政策的不断优化。因此，中国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强化农业专家人才的派送和农业示范推广基地的建设，提高对非洲友好国家的农业技术支持力度。同时，在优化非洲友好国家现有的农业支持政策，包括信贷制度、土地政策等方面提供经验，协助其建立和完善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持政策体系，为其实现自我发展和创新、引进外来农业技术和模式等提供良好的制度政策环境。向非洲友好国家分享和传授农业现代化发展管理经验、推广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并增加在非洲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基于此，可帮助非洲友好国家实现农业乃至经济的良性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购买力水平，增强农食系统的韧性，提高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

4.3 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农业贸易伙伴关系

此外，对于当前食物供能对外依存度较低的非洲国家而言，尽管其粮食安全状况没有受到俄乌冲突的显著影响，但在其低效率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仅依靠自我生产来满足食物消费需求，居民营养不足的状况也相对较差。根据表 2，平均而言，饮食能量供应对外依存度较低的国家，其居民营养不足发生率要高于饮食能量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

事实上，在购买力水平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贸易的自由化有利于居民营养状况的改善^[29]。中国可在维护现有中非农业贸易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与食物供能对外依存度较低的非洲国家广泛建立贸易合作。这既有利于改善非洲国家居民的营养健康水平，同时也可增加中国的食物进口来源，从而最终增加两国居民福利。

参考文献

- [1] FA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concepts of food security [R]. Rome: FAO, 2008.
- [2] DODO M K. Understanding Africa's food security challenges [M] // RIJEKA M B.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London: IntechOpen, 2020.
- [3] 樊胜根, 高海秀.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重新思考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1-8.
- [4] FAO, IFCD, UNICEF, et al.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transforming food systems for affordable healthy diets [R]. Rome: FAO, 2020.
- [5] CAFIERIO C, GHERI F, KEPPLER A W, et al. Access to food in 2021: filling data gaps. Results of twenty national surveys using the Food Insecurity Experience Scale (FIES) [R]. Rome: FAO, 2022.
- [6] FAO. The state of the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R]. Rome: FAO, 2022.
- [7] TARRANT J R, 李晨曦, 吴克宁. 粮食能不能作为武器?: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粮食贸易禁运 [J]. 世界农业, 2016(12): 64-70.
- [8] CALDARA D.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12(4): 1194-1225.
- [9] 韩冬, 钟钰.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及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响应 [J]. 俄罗斯研究, 2022(3): 55-80.
- [10] 王明利, 鄢朝辉. 俄乌冲突对世界及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J]. 经济纵横, 2022(7): 97-106.
- [11] FAO. FAO food price index posts significant leap in March [EB/OL]. (2022-08-04) [2022-08-09]. <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fao-food-price-index-posts-significant-leap-in-march/>.
- [12] FAO. The importance of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r global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R]. Rome: FAO, 2022.
- [13] 张梦颖. 俄乌冲突背景下非洲粮食安全的困境 [J]. 西亚非洲, 2022(4): 51-66.
- [14] DEL GOBBO L C, KHATIBZADEH S, IMAMURA F, et al. Assessing global dietary habits: a comparison of national estimates from the FAO and the Global Dietary Database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15, 101(5): 1038-1046.
- [15] 杨明智, 裴源生, 李旭东. 中国粮食自给率研究: 粮食、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分析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4): 881-889.
- [16] FRISON E, SMITH I F, CHERFAS J, et al. Using biodiversity for food, dietary diversity, better nutrition and health [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05, 18 (2): 112-114.

- [17] VAN DER MERWE J D, CLOETE P C, VAN DER HOEVEBN M. Promo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food crops [J].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2016, 40 (8): 830-847.
- [18] 中国营养学会.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速查手册(2013版) [M].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4.
- [19] 杨月欣. 中国食物成分表: 第一册(标准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8.
- [20] FAO. New FBS methodology-description of utilization variables [EB/OL]. (2020-01-09) [2022-08-10]. <https://fenix-services.fao.org/faostat/static/documents/FBS/New%20FBS%20methodology.pdf>.
- [21] CLOTE P C, IDSARDI E F. Consumption of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food crops: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from South Africa [J].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2013, 37 (8): 902-914.
- [22] 胡冰川. 粮食安全背景下的大食物观 [J]. *中国发展观察*, 2022 (6): 81-85.
- [23] 卜伟, 曲彤, 朱晨萌. 中国的粮食净进口依存度与粮食安全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34 (10): 49-56.
- [24] FAO. 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quarterly global report No. 2 [R]. Rome: FAO, 2022.
- [25] BONILLA-CEDREZ C, CHAMVERLIN J, HIJMANS R J. Fertilizer and grain prices constrain food produc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J]. *Nature Food*, 2021, 2 (10): 766-772.
- [26] DAUM T, BINER R.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Africa: myths, realities and an emerging research Agenda [J]. *Global Food Security*, 2020, 26: 100393.
- [27] GATES B. Why I love fertilizer [EB/OL]. (2018-11-14) [2022-09-02]. <https://www.gatesnotes.com/Development/Why-I-love-fertilizer>.
- [28] WFP. Bulk carrier sets off from Ukraine with grain for WFP in first since start of war [EB/OL]. (2022-08-16) [2022-09-05]. <https://www.wfp.org/stories/bulk-carrier-sets-ukraine-grain-wfp-first-start-war>.
- [29] THOW A M.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mapping the pathways for public health nutritionists [J].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2009, 12 (11): 2150-2158.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Russia-Uzbekistan Conflict on African Food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Energy Supply Structure

ZHAI Tianchang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unique dietary structure of African residents, when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on the food security of African countries,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energy provided by various foods to the residents. Based on the external dependence of the dietary energy supply of African resident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on African food secur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nearly half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low external dependence on energy supply in their diets, and in their traditional Under the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will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s food security. In fact, the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mainly in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that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foreign food supply and have poor food purchasing power. Under their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will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food security. Based on this,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 can provide certain food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friendly African countries that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external dietary energy supply and lack purchasing power as soon as possible. Further,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African friendly countries, shar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trade partners in Africa. So that to contribute China's power more effectively to ensure the food security of African countries, thus making new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Food-To-Energy Ratio